



Dr. Mezouar Mohammed Said (梅祖尔·穆罕默德·赛义德博士) (是一位阿尔及利亚裔英国哲学家、学者、作家和教育家。他因在现象学、教育心理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工作而闻名。他任职于伯明翰城市大学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并出版了多部著作和论文。

背景与成就

梅祖尔博士于1988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特莱姆森 (Tlemcen)。他广泛使用阿拉伯语和英语进行写作，作品经常探讨阿尔及利亚身份、记忆和归属感等主题。他的哲学研究以逻辑清晰以及与当代知识分子讨论的深度互动而著称。

主要专业领域

- **哲学**：专注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文学，探索内在知识和人类存在的复杂性。
- **教育与心理学**：侧重于教育心理学、学习者心理以及当代教育思想。
- **文化研究**：通过文学分析和文化评论，研究阿尔及利亚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动态。

代表著作与媒体

- **《学习者心理学》(Sikolojia al-Muta'allim)**：(一本探讨学习者人格维度以及心理和社会因素影响的知名著作。
- **《狩猎：在阿尔及利亚竞技场》(Hunting: In DZ-Coliseum)**：(一部通过叙事探索阿尔及利亚身份的作品。
- **播客与文章**：他主持播客并在 Medium 等平台上发表文章和访谈。
- **学术档案**：有关其论文和研究的更多详情，可见于其 Academia.edu 个人主页。

我叔叔在芝加哥接受训练

姆祖瓦尔·穆罕默德·萨伊德

我出生在“阿拉伯马格里布明珠”的郊区，在阿尔及利亚西部，在“哈贾”城的医院里。直到今天，母亲仍时常向我诉说，那位俄罗斯助产士如何在我脆弱的身体经过水和其它液体后，将我拥入怀中，用棉布条将我包裹，然后交给我的母亲。母亲在经历了巨大的生育痛苦和对不孕幽灵的极度恐惧后，以先知艾尤布（愿主赐他平安）般的耐心等待我的降生。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是这个居住在阿尔及利亚深部小镇的朴素家庭的长子。在那里，阿尔及利亚的丛林舒适地吞噬着它忠诚的子孙。

我的祖母（愿主慈悯她）是最亲近的人之一，她在我天真无邪的童年里留下了严厉与温柔的印记。对于像我这样刚开始形成记忆的小孩子来说，她就像丝绒手套里的铁拳。作为这个朴素大家庭的女主人，在失去了丈夫——我的祖父（愿主慈悯他）——之后，她选择为子女们而活，全身心照料家庭。她成了我温柔的母亲之外，对我性格塑造贡献最大的人，塑造了我内心那个狼性斗士的性格。她依据自己年轻守寡的经历、在贫困和尊严中生活的经历——尽管有时需要艰难地移居摩洛哥边境，有时失去精神支柱，有时甚至需要面对历史和各种人形生物以保护她的孩子们——教会了我自卫的艺术。对她而言，孩子们就是她珍贵的宝藏。她养育出了一位正直的会计师，一位严肃勇敢的自然科学老师，一位从智慧中汲取营养多于从其它美德中获益的牙医，还有两个成为体面家庭主妇的女儿。

有一天我醒来，那是在我至今都不喜欢的午睡时间，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在身边找到母亲。我在房间里四处寻找，但无济于事。我躺了一会儿，看着用木头和许多芦苇秆装饰的天花板，然后观察周围的一切：床铺、大衣柜、电视和其他物品。之后我决定继续寻找母亲，于是我爬向那扇巨大的木门，极其费力地打开了它，然后将我那双小眼睛投向远方。外面正下着雨，这使得房间入口处那棵挺立的大橄榄树下的水池积满了雨水。我艰难地朝它爬去，因为房间外的地面粗糙，在这样的地面上爬行常常给我带来痛苦的伤痕。但水的景象吸引了我，促使我忍受痛苦和折磨去接近它。之后，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大水坑中央，身下是松软的泥土，周围是相对温暖的水，我开始享受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玩水。正当我沉浸其中时，我的祖母（父亲的母亲，愿主慈悯她）从毗邻我们乡村房子的家里出来，发现她宠爱的儿子正在一个满是泥泞的水坑中央的雨水中玩耍。她发出一声惊叫，引得我母亲跟在她身后跑了出来。母亲急切地从水中抢过我，担心她的孩子。然后，在祖母连珠炮似的责备声中，她把我抱进房间，用尽一切办法试图把我擦干，同时检查我小小的身体。之后，我发出了响亮的哭声，那哭声是对她们俩的责备：她们怎么敢剥夺我在水中玩耍的乐趣？我喜欢水啊！

直到现在，洗澡时坐在浴缸里玩水仍然让我感到放松，即使我已成年。我每周都会去公共浴室，专门留出时间享受玩清水的乐趣。我会去我们城市高处的“拉拉·斯蒂”地区，坐在

她附近的水池边，用美丽的池水愉悦我的眼睛。我也会去位于城市中央的"国王水池"，坐在那个美妙的水池边。我的眼睛依然向往着地中海。每个夏天我都会去"本·迈希迪"港的海滩享受海景，利用潮起潮落观赏它美丽的泡沫。所有这些都让我成为波塞冬（Poséidon）的崇拜者，他是最喜欢的神祇，因为他是无可争议的海神。

我也喜欢欣赏轮船航行的景象，渔船的景象和渔民的故事也深深吸引着我。在我光顾高档餐厅时，我最喜欢点的美食是鱼（阿尔及利亚方言称为"胡特"）以及与海洋相关的一切。我也经常观看讲述海洋和大洋故事的纪录片，其中最美丽、最贴近我心的电视节目，是那些讲述海战的，无论是关于潜艇、战列舰，甚至是航空母舰。也许这让我成了一个"水之子"，一个水的爱好者。当听到大学里的一位教授向我们解释，一位名叫泰勒斯（Thalès）的哲学家——"理性（自然）哲学的奠基人"——是第一个提出"水是万物之源"的人时，我的喜悦倍增。

我也喜爱《古兰经》众先知章第30节经文，它教导我们水是生命之源。我曾并仍然渴望去参观一个名叫"达夫拉泉"的水源，它位于塔姆克萨勒特地区，因为那里装饰着一块警示牌，警告游客不要用淡水洗车，但警示的开头却用了那句尊贵的经文。

我也记得去加扎乌特（Ghazaouet）沿海渔市的访问，以及我对那座城市的深深热爱，那里是我祖先（愿主慈悯他们）的出生地。我们的血统可以追溯到曾效力于埃米尔阿卜杜·卡德尔军队的战士们。在那座城市郊区的"穆卡塔阿"战役以及埃米尔向法国人投降之后，这些祖先（愿主慈悯他们）驻扎在那个地方，放下刀剑，拿起斧头，建立了极为高贵的家族。他们的子孙后代始终反抗不公和压迫者。我的反叛精神和对海洋与水的永恒之爱正源于此。

我的生活介于在炎热的日子里与叔叔们中午洗澡，以及陪伴我的牙医叔叔去山谷放羊之间。我也曾陪伴我的祖母（父亲的母亲，愿主慈悯她）去拜访散居各处的邻居。有时，我和我的"牙医"叔叔会经过葡萄园，那里的看守"我的堂兄布赫达"总会慷慨地给我许多串新鲜葡萄。之后，我们会经过一个冰冷的泉水，用许多野生浆果完成我们的盛宴。晚上，我们会接待我的哈吉叔叔——"贵族后裔"，以及他的兄弟侯赛因叔叔（愿主慈悯他），还有一群男孩女孩，他们会争着抱我，带我在无花果树和仙人掌果树周围转悠。我多么喜欢哈吉叔叔"贵族后裔"在果园间进行的狩猎活动，那只是为了吓唬栖息在该地区的狐狸，让它们从藏身处惊慌逃窜，躲避近在咫尺的火药枪声。

多年以后，我明白了有些叔叔需要我尊敬，有些姑姑需要我听从她们的嘱咐，我有一位祖父（愿主慈悯他）可以享受他的宠爱，尽管他管理着一个非常庞大的家庭，里面有足够多的（外祖父母那边的）儿女、孙辈甚至曾孙辈。我有一位（外）祖母（母亲的母亲），一位眼睛美丽、举止优雅的女性，愿主慈悯她，她非常喜欢巧克力、各种各样的香水，甚至喜欢用银饰装扮自己。她是一位极其勇敢的女性，以无与伦比的能力管理着一个成员多样的家庭。她从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殖民统治（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的武装革命中获得的经验，使她具备了足够的严厉，能够自信地面对生活。

我的母亲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最小的女儿，因此她是家里的宠儿，尤其是我外祖父（愿主慈悯他）的掌上明珠。这使她直到今天仍是许多人嫉妒的对象，嫉妒来自双方。我的姑姑们至今仍无法摆脱她们那致命的嫉妒心；我唯一在世的小姨，至今仍认为我母亲是那个剥夺了她父亲（愿主慈悯他）宠爱的女孩。结果，我母亲发现自己夹在中间，置身于只有女性才擅长编织细节的阴谋诡计之中。这常常让她无辜地哭泣，那种哭声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就像美剧《混乱之子》（sons of anarchy）中那首“迷失的男孩（the lost boy）”。正是这部美国剧集让我对奥比的死感到极度悲伤。

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阿尔及利亚人生活方式的反叛者，在我深感自豪的古老柏柏尔血统与我信奉的伊斯兰教（它存在于我的心中、部分实践和大多信仰中）之间摇摆，还有我的阿拉伯语舌头——我认为这是我思想和文化身体上无法抹去的纹身，尽管我精通英语、法语（罪恶殖民者的语言）和一些阿尔及利亚方言。确实，正如尼扎尔·格巴尼（愿主慈悯他）所说，阿拉伯特性就像身体上的纹身。

我生命中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些小插曲，比如我极度依恋其中一条短裤，我非常喜欢穿它，甚至拒绝为了清洗而脱下它，这常常惹怒我的母亲，让她厉声尖叫。

我记得有一次晚饭后和父亲玩耍时发生的事故，弄伤了我的手。第二天，父亲为此进城给我买了一件玩具。尽管我非常喜欢那件玩具，但我却无法享受它带来的乐趣。只有祖母（父亲的母亲，愿主慈悯她）用橄榄油代替药膏为我做的几次按摩，才让我有所缓解。

我记得堂兄的老师不时来访，看到他们我总是很高兴，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总会给我带来很多糖果和礼物。

我们住在一个简朴的乡间房子里，过着充满自尊的生活。家庭相对和睦，尽管有一些例行的摩擦。树木环绕着我们，我们饲养着一些动物：狗和猫，还有祖母（父亲的母亲，愿主怜悯她）的羊和驴。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母亲摆好晚餐桌并准备好食物后，我想吃桌上一个盘子里的法拉费尔饼。尽管父亲警告我会生病，但我没有理会，这促使母亲介入，不让我得逞。这一举动让我哭着跑向附近的花园。我独自坐着，开始嚎啕大哭，这惊扰了一只母狼，它发出了响亮的嚎叫，吓得我立刻跑回了我们的房间。这件事直到今天仍深深地印在父亲的记忆里，一有机会他就会讲给我听……尽管条件艰苦，那却是一个美好的童年。

我的手机闹钟在凌晨四点响起，我关掉它继续睡觉。然后闹钟在五点再次响起，我又关掉它，从每天侵袭我睡眠的梦魇和忧虑中稍作喘息。不久后我看了一眼手机，发现时间已经过了五点半几分钟；我像受惊的苏菲派信徒一样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走向浴室，洗了脸和手脚，然后回到房间，为出门做准备：选择今天要穿的衣服，梳理我浓密的头发，然后坐下戴上手表，口袋里装一些钱，换上我的近视眼镜，拿起钱包，把手机放进口袋。之后我走下楼梯，朝外面走去，新一天黎明的第一缕微风彻底唤醒了我，而我正前往阿尔及利亚一所偏远的学校，去见我可敬的学生们。

阿尔及利亚所有忠诚的天才和疯子，无论持有何种文凭，都会发现自己是她贫困学校的教师。要么教阿拉伯语，要么教法语，为了一份月薪——每天不超过五欧元——疲于奔命。其中一半花在文具和日常饮食上，剩下的则浪费在咖啡馆的桌子上或仍处于史前时代的交通工具的椅子上。

那天我七点半到达学校——提醒一下，我六点差十分离开房间——换乘了两辆公交车，行程超过三十五公里。我在一家咖啡馆喝了一些牛奶，那种加了巧克力的，还吃了一点当地传统小吃，方言称为“兰姆西斯”。和往常一样，我走进校长办公室，他带着狡黠的微笑接待了我。我问他那天有什么新鲜事，他便趁机根据他的经验和在教育领域遇到的困难给我一些建议。之后他开始抱怨国家和人民的状况，并再次提到我国教育部门负责人一些恶劣的行为，引用一些我们谁也不明白其含义、存在原因或由谁负责执行的法律法规。之后，其他同事也来到了校长办公室，这位直接上级对我们所有人的抱怨变成了对我们处境的戏谑和嘲讽。然后，升国旗的时间到了，差五分八点。我们都出去，在因为寒冷而在学校院子里瑟瑟发抖的学生们面前，完成我们已经习惯了的那些仪式。之后，在我的学生们进入教室后，我才进去。

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开玩笑，亲吻另一些人。我把我的公文包和帽子放在讲台上，穿上我的白色围裙，然后在黑板上写下今天的日期。现在是三月初，也是这一天上午时段的开始。

我沉浸在教学之中，尤其是因为今天是周一，也是第二学期考试后的第一个星期。我察觉到小学生们的不安，于是着手安抚他们，告诉他们成绩非常好。然后我在理解听说、口头表达之间切换，并以一节数学课结束上午的教学。

我和学生们一起离开教室，向他们告别，并确认我们下午的到校时间——中午十二点四十五分。之后，学校的保安建议我去该地区一家咖啡馆的桌子旁坐坐。

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经过校长办公室时开玩笑地告诉他，我要离开一会儿，找个地方放松一下再回学校。在我们前往咖啡馆的路上，经过一家甜品店，我买了一些“千层酥（mille feuilles）”。

在咖啡馆桌旁，我听到了那天最离奇的故事，主角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她已婚，对邻居、尤其是女性邻居言辞尖刻，但生活不检点，一有机会就背叛她的丈夫。碰巧，她回应了一些青春期男孩的搭讪，用她强烈的魅力与他们调情，要知道阿尔及利亚人都很清楚这个国家年轻人灵魂中根深蒂固的痴迷——压抑是他们的信仰和习性，驱使他们走向愚蠢。

这些年轻人感到被一个已婚女人羞辱了，她承诺给他们想要的女性欢愉，却又玩弄他们，然后完全否认与他们有过任何接触。于是他们持刀威胁，在她丈夫的房子里、在邻居和那天街上所有人的注视下绑架了她，然后胁迫她到了一个偏远而隐蔽的地方，轮流无情地强奸了她，持续了整整一天一夜，最后把她赤身裸体地扔在路边。尽管安全部门拥有各种技术手段，却无法确定她的位置。直到黎明时分，她才在一个震撼人心的悲剧场景中回到家，而这一幕将永远震撼人心。

听到这个我不知道主角是谁的真实故事时，我浑身发冷。但给我讲故事的人认识他们每一个人，只是没能在我面前说出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主动要求他不要提名字。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从这类故事中汲取教训，而不是对与我无关的人幸灾乐祸。

之后我回到学校，和我的学生们——无论是淘气的还是安静的——一起完成下午的课程，然后离开学校回家。当然，像往常一样，我回到房间开始我个人的日常仪式：吃饭、祈祷、阅读和写作，很多时候也会上网浏览，观看许多录像，试图忘记屋外发生的事和从早上开始遇到的一切。

我和我的"小"叔叔们生活得非常惬意。我和我的教师叔叔一起去咖啡馆，他热爱生活，穿着考究，在各种季节参加各种派对，从他任教的高中举办的年终派对开始，一直到婚礼。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他带我去参加了其中一个派对——高中的派对——并悄悄对派对主持人耳语，让我给那天的一位来宾送礼。那一刻的善意之举在我心中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喜悦。

为了公正地评价我的教师叔叔，我对他的感情混杂着愤怒和思念。我视他被我们大家庭所"绑架"，因为他娶了一只"猫头鹰（Chouette）"，那只猫头鹰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小家庭幸福的凶兆，她离间了兄弟之间、母子之间的关系，原因很简单：她内心的野蛮自私，使她的所有行为都充满了染上怨恨的报复心。在这些情感纠葛中，一个曾前途无量的男人的火焰熄灭了。他曾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但当她独自做出了一个决定，尽管大多数真心爱他的人都反对，他却一意孤行，最终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他的社会地位、家庭形象和日益衰退的健康。因此，大多数时候，一个人在犯错时必须仔细审视自己的行为，并且必须修复可以修复的，因为拖延修复会提高我们错误账单的成本。

我童年遇到的最美好的事是我大姐的出生。留在我记忆中的是，那是一次艰难的分娩，因为我亲爱的母亲（愿主佑助她）那天没有被送到医院，而是由我们地区的老妇人们负责接生，生下了一个非常美丽、极其安静的女孩。直到今天，我仍然嫉妒她的那份宁静。

我的大姐美貌绝伦，她结合了母亲（愿主佑助她）的美貌和父亲（愿主使他长久陪伴我们）的沉稳与庄重。她度过了一个艰难的童年，就像我们那一代所有人一样，但她是跳动着智慧源泉。她很少尖叫，性情非常温和，聪明，甚至可以说敏锐，然而她的善良也给她带来了许多麻烦，因为她并不狡诈，而狡诈无法侵蚀纯洁无瑕的心灵。

我的大姐像每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阿尔及利亚女孩一样，按部就班地完成了学业：小学、初中直到高中。尽管她属于"洋蓟"科——文学和哲学，并且有历史记载，她在那一年复习功课时并非完全松懈，生活也并不马虎——直到此刻，她都以无与伦比的认真著称，尽管年纪尚轻。然而，一年后，她给我们带来了喜悦，成为第一个让我们尝到成功通过高

中毕业会考（Baccalauréat）滋味的人——那是阿尔及利亚丛林中最难的考试。家庭为那次成功感到无比高兴。

我的大姐直到我大学毕业那天才进入大学，意味着她从未在大学的椅子上学习过，尽管她注册的是语言系阿拉伯文学专业。她转而嫁给了一位善良的军人，并为他生了两个美丽绝伦的女儿——她们是我心中最亲近的人，还有一个很棒的儿子，他名字里包含我名字的一部分。所有见过他的人都注意到我们之间巨大的相似性，尽管年龄差距悬殊。实际上，我甚至回去看我童年的照片，把我大姐的儿子和我小时候的样子进行比较，发现确实有一种难以置信的相似，这让我和大姐亲近了许多。我对她孩子们的喜爱无以言表，对她和她丈夫的尊重也难以用言语表达。

别跟我谈爱国主义（Le patriotisme），别跟我谈热爱阿尔及利亚这个美丽的国家。这个国家无情地吞噬着它忠诚的子孙，没有任何怜悯或同情能阻止这种温柔的野蛮行径。别跟我谈对国旗的自豪感，也别在我耳边重复那些令人作呕的响亮口号，关于这片土地忠诚的儿女为她所做的牺牲。要知道，我每天都和我的小学生们一起笔挺地站立，履行着升降阿尔及利亚国旗的仪式。如果有人问起为什么有些照片里我旁边是其他国家的国旗，我可以回答：那是对一个耗尽了我所有精力，却让我成为归属上的孤儿、吞噬我的权利、浪费了我的青春和整整几代人青春的国家的某种谴责。它将幸福拱手让给了那些卑鄙地背叛它的人。

阿尔及利亚解放革命始于二十世纪的1954年，是一场针对罪恶的法国殖民统治的残酷战争。期间有数百万阿尔及利亚人被杀。别跟我提阿尔及利亚官方的数字（一百五十万烈士），因为事实讲述了许多无名死者和无名乱葬坑的故事，甚至还有许多法国人可恶的绑架和逮捕行径的故事。他们想让阿尔及利亚的土地永远处于他们的旗帜和有毒文化之下。所有这些罪行都是为了保持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属性。然而，阿尔及利亚的男人和女人决心驱逐一切法国的东西，或者用他们的话说，一切“高里（外来殖民者）”的东西，这个术语特指所有侵占阿尔及利亚土地的欧洲人。

所有这些用生命、金钱、甚至努力和生活付出的高昂代价，最终都化为乌有。独立后来被窃取，阿尔及利亚陷入了一个无尽的黑洞。在这一切之中，整整几代人的抱负都消失了。而昨天的叛徒们，却在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国家机器中掌握了权力，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一个只有两个阶级的社会：新殖民者阶级和注定贫困的原住民阶级。

我的祖先们（愿主慈悯他们），像所有高贵的阿尔及利亚人一样，奋起反抗法国。他们在特莱姆森省07号国道（RN7）路旁的农场、他们的钱财、所有物质资源以及他们的训练经验，都服务于民族解放阵线（FLN）的领导人。有很多故事流传给我们这些子孙，关于深厚的联系和高精度的战斗任务，其中就有伟大的领袖“黑夜之踵”参与——这只阿尔及利亚雄狮，正如法国文件本身所记载，那些文件来自《革命中的革命》一书，以及其他领导人如阿卜杜勒·哈菲兹和他的团伙。

我祖先（愿主慈悯他们）的农场变成了一个仓库，存放从摩洛哥边境运入阿尔及利亚并分发到全国其他地区的武器。他们房子旁边的空地变成了晚上训练阿尔及利亚战士的场地。他们的一些女性成员也加入了民族解放军，特别是我的“蓝眼睛”祖母，她隶属于支援和联络小组，参与了极其危险的行动。

为了伪装，我的祖先（愿主慈悯他们）在武器库门口——也就是他们农场中央的一个深坑——放了一些蜂箱，以免法国士兵和他们遍布该地区的众多线人注意。但据说，一个名叫（哈吉）奥马尔的阿尔及利亚叛徒有一天潜入我祖先的农场偷种在那里的洋葱，从而发现了秘密。之后他去了萨布拉（Turenne）村的法国士兵中心告密，这使他后来成为了法军的忠实走狗，并为他打开了荣耀和财富的大门，代价是阿尔及利亚忠诚的弱小人民的鲜血。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这片土地吞噬它的子孙，却将福祉献给卑鄙的叛徒？.....尽管如此，我仍然深爱阿尔及利亚，它是我无法改变的皮肤。我不可能变成那个通过阿尔及利亚式的科学力量从黑人变成白人的美国歌手。

罪恶的法国军队欣喜地接收了这份告密，下令扫荡该地区，并带着叛徒奥马尔登上他们的军车前往“瓦萨尔”地区，指认那些为解放阿尔及利亚而战的高贵自由战士——“卡比尔人”的农场。

军车抵达并停在农场对面，以便叛徒奥马尔确认地点。事实也确实如此。法国军车继续行驶作为一种伪装，但它被我祖父穆罕默德（愿主慈悯他）察觉了。当时他和他儿子哈吉·穆罕默德正在农场的角落干活。凭借被强征加入罪恶的法国军队服役的经验，以及作为二战中在前线对抗德国纳粹的经历，我祖父穆罕默德（愿主慈悯他）识破了这个圈套，宣布农场进入紧急状态。他逃往摩洛哥边境成为政治难民，妇女们则前往法国集中营，他的兄弟们——愿主慈悯我的祖父艾哈迈德和我们深爱的祖父阿卜杜勒·卡德尔——则加入了他们的斗争兄弟，拿起武器对抗官方法国。由于那天法国人和他们的叛徒走狗没能抓到自由战士，他们便对农场里的树木和动物进行报复，杀死了大部分动物并烧毁了庄稼。与此同时，我的三位祖先（愿主慈悯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奋斗，直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土地独立。之后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农场，并相当成功地使其恢复了生机。直到今天，这座农

场仍然是他们阿拉伯邻居背叛行为的见证，并且仍在子孙后代的照料之下。子孙们种植果树并照料它们，而他们的一些邻居直到今天仍在偷偷盗窃他们的收成。冲突至今仍在继续，背叛如同荣誉和高贵一样，一直遗传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子孙继承着祖先高贵的荣誉，而叛徒奥马尔则将通过背叛祖国阿尔及利亚获得的财富遗产留给了他的子孙。

在我心中激起深深悲伤和对我们在学校座位上所学到的虚假爱国主义进行反叛的，是我祖母"蓝眼睛"（愿主慈悯她）去世的悲剧。

这位祖母一生贫困，但英勇战斗过，许多历史证词支持这一点。在阿尔及利亚土地独立后，她和我的祖父艾哈迈德（愿主慈悯他）**一起建立了一个农场**，属于虚假的农业革命框架。像当时所有虚幻的项目一样，这个项目也陷入了失败的陷阱。之后，他们靠着祖父（愿主慈悯他）领取的微薄养老金生活。在他去世后，由于这笔钱太少，境遇迫使她——**因为失去了唯一的依靠——去敲"叛徒奥马尔"的门**，请求租用他的一间房子。当然，这个叛徒答应了请求，认为这样的处境是洗刷一些他对我们家庭所犯罪行的机会。我的祖母"蓝眼睛"（愿主慈悯她）死在了那个告发她和她丈夫的人的房子里。**所以，从今往后别再跟我谈爱国主义**。发生在我祖先身上的事是我在这方面学到的最好一课。我没有也绝不会反对我的国家阿尔及利亚，没有也绝不会背叛这个美丽国家和这个善良人民的利益，因为我是自由贵族的后裔。但是，别要求我做出更多牺牲，也别恳求我原谅叛徒的子孙，甚至他们的后代。因为在我们这些贵族（les nobles）和他们那些罪恶的叛徒之间，流淌着鲜血、悲剧和悲伤的河流。愿主慈悯自由的男男女女。

这是今年早来的春假，这个决定是穆拉迪亚宫在上周最后一天的最后时刻突然做出的，因为新冠病毒正在吞噬世界，成了街头巷尾的话题，以各种语言侵占了卫星电视频道，甚至成了所有社交媒体用户的官方赞助商。尽管如此，我并不关注这件事，除了我在推特个人主页上写过一句话：新冠时期的爱情，这是我从伟大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中获得的灵感。

我和家人一起坐在午餐桌旁，我大姐的女儿们——特别是那个亲近我心的小女孩——为这次聚餐增添了色彩。她用一种奇怪的、但我很喜欢的称呼叫我："老师舅舅"。与此同时，父亲对当局限制礼拜场所包括清真寺的决定越来越不满，认为它们是助长致命新冠病毒传播的地方。他暗示礼拜场所的神圣性应该完全保护其访客，类似于"天房有主保护"的道理。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巴基"正在玩耍，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他正处在他第一年生命的最后一个月。母亲把他放在学步车里，他正处于站立阶段，但还没有勇气自己迈出第一步。这对某些人来说只是一个暂时的阶段，但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终其一生都害怕独自迈出步伐，这是阿尔及利亚公众集体心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结束了用餐，甚至不记得是怎么吃完的。然后我上楼回到我们房子二层的房间，躺在床上，许多思绪涌入脑海。记忆——那常常让我失望的记忆——将我带回到阿尔及利亚的流血岁月，那些以死亡、恐惧、不公、逮捕、绑架、强奸以及在阿尔及利亚独裁统治的地窖监狱中前所未有的贪婪和虐待狂般的酷刑为特征的岁月。

阿尔及利亚人天性憎恶不公（l'injustice）和不公者，但他们同时既是压迫者也是被压迫者。在阿尔及利亚土地从官方法国独立后诞生的独裁政权，滋养了阿尔及利亚人身上的这种虐待狂倾向，利用他们执行肮脏的勾当，其残暴程度超过了人类历史上所有形式的野蛮行径。

阿尔及利亚经历了未经选举的本·贝拉总统的独裁时期，然后是政变上台的名为胡阿里·布迈丁的总统时期，接着是被任命的沙德利·本·贾迪德总统时期。在他被解职后，国家陷入了血腥冲突的漩涡，最终陷入了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的可怕独裁。因此，阿尔及利亚公民从未知道"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一词的含义。

在我记忆中保留的最艰难时期之一是黑暗-红色的十年，或称流血十年，因为它夺走了我无辜的童年。在我生命的最初几年，我没有享受与同龄人玩耍的乐趣，而是和我那个在1997年夏天离开祖屋的小家庭一起受苦。我们在侯赛因叔叔（愿主怜悯他）家度过了几天，之后父亲在萨布拉（Turenne）村中心租了一间大房子，全家都搬了过去。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直到一个恐怖的夜晚，发生了一场极其野蛮的战斗，受害者是一位名叫"阿依德"的公民，他被割喉杀害。这一事件导致了塔姆克萨勒特村的居民外迁，其中包括我的小姑娘一家，他们当然也加入我们，住进了这个新家。

房子变得拥挤起来：我们一家，教师叔叔一家，小姑娘一家，当然还有祖母（父亲的母亲）。我大伯父们的家庭也经常来访，每次拜访都带着可恶的流言蜚语种子和定时社会炸弹。大家庭无法承受这一切，最终整个局势在我们面前爆炸，起因是一起我至今仍未理解其影响和原因的事件。

一天晚上，我和大姐与父亲在屋外，准确地说是在门口。突然，屋内传来高声尖叫。我们急忙跑进去，发现了一桩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是犯罪的事件：我的“猫头鹰”婶婶用一把厨房刀袭击了我的母亲，试图用它杀害她。到处是尖叫、逃跑、哭泣和哀嚎，甚至还有血迹。那完全是悲剧性的时刻。

袭击我母亲的婶婶至今仍然逍遥法外，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当时的环境为她开脱了。伤口从那时起就一直敞开着。我仍然无法忘记父亲用毛巾在我倒地母亲脸上挥舞时的眼泪，他夹在荣誉、维持家庭、对抗伤害他家庭中心的不公、可能失去他的兄弟，以及究竟是服从母亲还是违抗她以伸张正义之间。

最终，父亲选择了委屈我的母亲，并服从祖母（他的母亲）以维护自祖父穆罕默德（愿主慈悯他）去世后他们所建立的一切。他让我母亲在留下和离婚之间选择，并保护了他的教师兄弟和他那犯罪的妻子。而我可怜的母亲将她的申诉交给了集合所有争议者的真主，但除了一个晚上，当她将所有压抑的愤怒发泄在袭击者的房间里的衣服和家具上时，她没有找到为她伸张正义的人。就这样，这件事被掩盖了，权利就像许多阿尔及利亚人在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土地上失去的权利一样消失了。

在这件痛苦的事件之后——我今天写下它，仍然感到巨大的愤怒攫住了我——我想起了中国智者孔子的话：“想要报复的人，必须先挖好两个坟墓，一个给自己。”父亲为我们租了一间新房子，我们搬了过去，同住的还有我的牙医叔叔和祖母（父亲的母亲）。命运的讽刺在于，房东是解放战争期间法国的线人，他住在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拥有那所房子，每年夏天都来度假，享受阿尔及利亚宜人的空气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特权。

这些红色的年月里印在我记忆中的，是罪行和极度的恐惧。国家危在旦夕，每天都有死亡，绑架和失踪者不计其数。我目睹的不幸事件中有两起犯罪我永远无法忘记。第一起发生在巴尔巴塔地区，一个家庭在一夜之间全部遇害，只有当天在祖母家的小女孩幸免于难。恐怖分子开枪打死了所有家庭成员，父亲虽受重伤且失血过多却幸存下来。但他在否认是伊斯兰团体所为，并在调查法官面前将罪行归于与阿尔及利亚情报部门合作的孤立事件参与者后，也被杀害。

第二起事件的受害者是一个极端贫困的家庭。户主是该地区非常知名的人物，因为他从事布毯制作。一天晚上，他家遭到入侵，他和他的儿子们被一个接一个地杀害，甚至连他失明的母亲也被无情地勒死。他的妻子在被执行这次野蛮行动的那支罪恶队伍的每个成员轮奸后也被杀害。

和许多阿尔及利亚儿童一样，我白天学习，晚上听到枪声和炮火声。我们有时玩炮弹残骸和子弹壳，我们最喜欢的游戏是追捕我们至今仍不知其身份的恐怖分子，尽管他们犯下了可怕的罪行。我们扮演保卫祖国的士兵角色。

当时流传的消息只有逮捕、葬礼、扫荡行动，很多时候是发现尸体的消息，或是"山中恶人"头目被杀的消息，或是这里或那里发生的战斗。那些日子里，阿尔及利亚人的鲜血是多么廉价。在可怕的国际社会沉默和所有人权组织的沉默之下，阿尔及利亚土地上血流成河，超过任何描述。甚至有些国家，如法国和沙特阿拉伯，公开支持并资助了在阿尔及利亚土地上的争斗者，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原住民）发动了一场毁灭性战争。

善良、自由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不是法国及其走狗要消灭的红皮肤印第安人。他们是说一口流利阿拉伯语、信奉多种天启和非天启宗教的柏柏尔人。他们非洲文化的根深深扎在滚烫的撒哈拉沙海之中。无论是罗马人、奥斯曼哈里发，还是罪恶的法国屠夫和刽子手的后代，都无法战胜这个只理解高贵和尊严词汇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因此，我预计阿尔及利亚在全球地缘政治版图上的主导地位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到来。

友谊对我来说从小就是一件大事，直到今天我仍认为它是一种奇妙的关系，能产生重要的生活经验。因为朋友（les amis）**是被阿尔及利亚公众有时归为兄弟、有时归为同事的人**。他们是人的支持，也是极其显而易见的秘密庇护所。一个人可以向亲近的朋友倾诉无法向父母或兄弟透露的事情，例如恋爱关系。

我生命中的第一个朋友是我小姑姑的儿子，他是"邦邦"。他现在不再是我的朋友了，因为我已切断了我们之间的联系，尽管他依然怀念。由于当时我们偏远的乡间房子远离村庄，我没有机会认识同龄的伙伴。离我们家最近的"卡里亚勒"村，我被禁止与那里的孩子交往，借口是他们鲁莽，我会变得像他们一样鲁莽。所以我变得孤独，或者说我生来孤独，并且我依然热爱我的孤独，因为它已成为我生活中一个非常普通的部分。

邦邦成了我的朋友，因为他时不时和他母亲一起来看望我们，我们也去拜访他们，因为他们首先是亲戚，其次我的小姑姑是我祖母（愿主慈悯她）的邻居。我被允许和他一起玩，因为他是"自家人"，因此在祖母（父亲的母亲，愿主慈悯她）、父亲、母亲、姑姑和叔叔们眼中，他带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因此，当时与我的朋友邦邦见面的喜悦无法形容。尽

管我们年龄相差两岁——他比我大两岁——但我们在一起玩耍。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最喜欢的游戏是扮演士兵打击恐怖分子。

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发生冲突。邦邦过去和现在都嫉妒我，甚至到了嫉妒的地步，原因是我过去和现在所生活的社会条件。尽管有缺点，但远比他所遭受并仍在遭受的剥夺条件要好得多。因为他是一个懒惰、懦弱的父亲的孩子，男子气概只体现在他那肮脏的下体上，认为生活是娱乐，晚上和妻子发生性关系，以及无休止的闲言碎语。因此他忽视了他的孩子们：邦邦、他的小妹妹，甚至他们的母亲（我的小姑娘）。这是我表兄弟和他兄弟们所穿着的复合无知的结果，就像我在雨天穿上我的外套一样。

后来我认识了我的朋友瓦利德（Paolo Maldini）。他成了我们的邻居，因为他们搬到了我们乡间房子的隔壁。我们之间建立了美妙的友谊，至今其微风仍为我们俩带来许多美好的回忆。我们一起度过了童年：日常的上学往返，每天在家附近聚会玩耍，约定一起看动画片和足球。如果不是因为那时我们父亲们在农田边界上的争执，我们的友谊本可以保持美妙和纯洁，尽管它依然牢固，这要归功于他善良的母亲——我的“贾米拉”姑姑，我祝愿她一切顺利。

由于学习，我有很多朋友，但这些都是暂时的关系，随着更换班级、转学或升学很快就结束了。但我仍然保留着一些，比如我和同事“费萨尔”的关系，他现在是一名护士；同事“萨米尔”，他现在在一家石油公司工作；同事“穆罕默德”，他现在是一名胸肺呼吸疾病专科医生。尽管这些友谊关系经历了种种变故，但当我回想起发生的许多事情，其中某个朋友扮演了某种角色，构成了我经验库中仍然存留的情境时，它们仍然影响着我。

我也无法忘记我的朋友“拉菲克”和他的堂兄弟“穆罕默德”，他们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是真正的支柱。还有我的朋友“巴兹纳提特”，没有他，我不可能获得高中毕业文凭，因为我度过艰难时光的一所破败学院围墙内，他扮演了激励者和支持者的角色。

人也不会忘记那些变成敌人的朋友，比如“亚辛”。由于我在大学学业上超越了他，嫉妒转变为怨恨，促使他参与破坏了我的一个阿尔及利亚家庭建设项目。还有他的同事兼我们共同的朋友“易卜拉欣”，他因为从小病态心理中根植的受辱情结而憎恨周围的每个人，这是他因失去一只眼睛而受到同龄人嘲笑的结果。事情发展到更危险的境地，后来他患上了血癌，这让他以敌人的眼光看待一切阿尔及利亚事物，并崇拜一切法国事物，渴望获得他在幼年和成年都未曾找到的地位。尽管如此，亚辛和易卜拉欣代表了阿尔及利亚失败的例子

，其中涉及各种环境和原因，最重要的是失败的阿尔及利亚教育体系——我正是其中的一名教师——未能培养出符合人性标准的公民。

布特弗利卡的独裁统治教会了原住民如何从狭隘的个人利益角度来看待友谊，借口实用主义，而这距离阿尔及利亚人的意识水平就像水星距离土星一样遥远。这使我们有时没有朋友，有时甚至无法维持哪怕是虚拟的朋友关系。社交媒体揭示了这一点。我们生活在一种精神上的流放之中，在其中挣扎，拥抱它，仿佛它是必须接受的注定或命运。

我有一个弟弟（un frère），他出生在流血十年的枪声中，出生于1995年1月2日的前夜。那天晚上，母亲被用一辆标致505送往医院。那是艰难的一天，我非常想念母亲，哭了很多。祖母（父亲的母亲）陪她去了，家人们对我彬彬有礼。甚至我的教师叔叔让我住在他家，让我看他那色彩鲜艳的电视，还把遥控器给了我。

在枪声中出生的人不畏惧死亡，这正是我们真实生活和言论的写照。弟弟出生一天后，父亲问我有什么合适的名字给他小弟弟的建议。我想了一会儿，**然后主动对他说：“我们叫他哈桑二世吧，以摩洛哥国王的名字命名。”我希望我的弟弟成为国王，这样我作为国王的兄弟就能成为王子。我希望我们生活在国王的安逸中，而不是贵族的责任里。**

父亲对我的回答感到惊讶，然后告诉我我建议的名字不合适，因为我提议得太晚了。我弟弟已经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艾哈迈德·亚辛。

这件事没有让我太烦恼，我也没有太在意这个主题，因为那时我想要一个伙伴来陪伴我的孤独和流放感，而有一个我可以照顾和一起玩耍的小弟弟的想法非常好。

那天早上，我堂兄穆拉德（小资产阶级）的豪华轿车停在了无花果树旁的橄榄树边。那是一辆德国奥迪（Audi）制造的车。他母亲哈吉·祖拜达（傲慢的女人）下了车，抱着一个不停哭闹的小婴儿。然后我的大姑妈和我母亲一起下车，母亲从那个女人手中接过了那个小婴儿。而我和姐姐站在墙边看着这一幕，对所有人都感到害羞。这时母亲叫我们：“你们不过来跟我打招呼吗？你们害怕吗？别怕！”

我们急切地走上前，向所有人问好。我平生第一次亲吻了我的弟弟。那时他是个身体羸弱、哭声尖利的孩子，裹在白色襁褓里，头上也盖着白布，而我母亲在一大堆无济于事的建议中显得脸色苍白。

那个孩子，今天是一个秃顶、长着长胡子的年轻人，是文学院的学生，主修英国文学和文明。他拥有的思想使他能够明智地领导自己的生活，在岁月的岩石上雕刻，以达到安逸阶梯上的宁静位置。因此，我在他身上找到了忠实的伙伴和善良的兄弟，尽管他竭尽全力隐藏自己高尚的情感。

确实！这是合适的描述。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伙伴，总体上影响着我并受我影响。我们一起玩耍，一起工作，一起进行了一些旅行，一起受苦，一起哭一起笑，一起为足球加油，一起听音乐，一起进餐厅，一起去海滩，一起分析政治事件，甚至一起经历写作尝试，我们还一起分享悲伤的时刻。他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兄弟，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也教了他一点。尽管他年纪比我小，但他的意见一直是我关键时刻的支柱。

我后悔小时候有时打他，也许源于嫉妒，有时源于对他的担心，有时源于我对他的爱。但我可以确定的是，我非常爱我的弟弟。他是一个我非常尊重的人。尽管我们犯过对自己或彼此的错误，但我感到他是最亲近的人，因为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远比伴随我们的肤浅和虚伪——它们构成了关于兄弟关系的错误刻板印象——更广大、更深刻。我母亲和父亲的儿子，我的兄弟，给你所有的爱和尊重。

宗教（la religion）对我来说纯粹是个人问题，是一种完全垂直的关系，只有两方：至高无上的真主和他面前软弱的仆人。因此，我不回答诸如“你礼拜吗？”或“你封斋或纳天课吗？”的问题，我也不向任何人提出这些问题。

像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我先从父亲那里学习了伊斯兰教的教义，然后通过地区的清真寺向我们传授了其余的宗教价值观，阿尔及利亚小学在伊斯兰教育的旗帜下完成了其余部分。因此，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卓越的宗教存在。

除此之外，还有关于“哈桑·班纳”——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的故事，通过其在阿尔及利亚的分支即“哈马斯党”。我的大家庭中有许多成员参与其慈善机构，其中最主要的是改革与指导协会，后来我发现这些组织是虚伪和谄媚的温床。

我经历了阿尔及利亚的黑暗十年，当时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主义者分裂为极端主义和温和派。极端主义者拿起武器对抗阿尔及利亚人民，他们强奸、抢劫、杀害和鞭打，以宗教理由为其辩护，最主要的是实施真主的法律或确立真主的界限。而所谓的温和派则接近执政当局，参与统治，即参与撕裂和掠夺阿尔及利亚。这方面的例子对于那些失去理智的人和理智者来说都很明显。

在我的家族中，也有“纳赫纳赫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愿主慈悯他），他是我的表兄弟“谢亚特帽”。他曾经是初中历史和地理老师，后来被贪婪和欲望蒙蔽了双眼，向我堂姐（贵族后裔）求婚。在无休止的纠缠和谄媚下，他娶了她。当然，不是为了她黑色的眼眸，也不是因为她耀眼的魅力诱惑了他，而是觊觎她的社会地位：她的父亲是与法国殖民主义作战的圣战者，一个富有的人；而她拥有法国国籍，还持有普通医学学士学位。这些条件对于任何渴望财富和地位的人来说都非常诱人，即使这个女孩不漂亮，因为金钱的语言拥有最高的权威。

这位“谢亚特帽”在儿童旅行活动的旗帜下加入了纳赫纳赫党。由于他在阿尔及利亚教育系统工作，他的角色仅限于打鼓和担任颂唱者，尽管他声音刺耳。然后他利用流血岁月期间领导层的真空，成为了该伊斯兰政党特莱姆森分部的骨干之一。他留起了稀疏的胡须，假装热爱阿拉伯语（因为他在法语等其他语言方面薄弱）。当然，与其他杰出的教师相比，他的阿拉伯语也很差。他扮演着伪君子的角色，表面上热切关注伊斯兰教，而他这种宗教伪装的目的是利用宗教博取周围人的同情，另一方面虐待他的妻子和女儿。然后他开始谄媚，在改革与指导协会的职位上逐步攀升，直到与协会的大头目建立了关系。这使他能够重返大学，尽管他语言和学术能力薄弱，却能作为学生不留级地学习，甚至在神秘力量的作用下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平。现在，他在毕业同年就在谢利夫市的大学找到了职位。这是何等的关系在支持他！

这类人的榜样让穆斯林对宗教感到厌恶，也让非穆斯林以怀疑和猜忌的眼光看待伊斯兰教。

我的表兄弟“谢亚特帽”在不知不觉中教会了我，伪信武器是对阿尔及利亚人民思想最危险的东西。你很容易通过自己的行为欺骗阿尔及利亚人，为自己描绘出一个虔诚的宗教人士形象。如果你再给这些行为加上对权势者的谄媚和顺从，你将在我们国家获得可怕的社会地位。尽管如此，我在表兄弟“谢亚特帽”身上看到了奴性的象征，而且是最丑陋的形式。这种奴性被称为“自愿奴役”，奴隶选择自己的主人，并对自己的选择完全满意。

我无法假装虔诚。我是一个远离人们目光礼拜的穆斯林。因此我不去清真寺，因为我们的清真寺已经成为像“谢亚特帽”及其同类这样的伪君子的滋生地。尽管伊斯兰教被强加了许多东西，但我认为它比这些人伟大得多，我确信真理显现、虚妄消亡的日子比人们预期的更近。

我的青春期（l'adolescence）开始得很早。我属于早熟的一代，莱伊音乐在这方面帮助我们。我们热切地追随谢卜·侯斯尼、谢卜·马米、谢卜·哈立德和谢卜·阿齐兹的歌曲，这些都是浪漫的歌曲，性暗示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和每个朴素的阿尔及利亚人一样，对女孩的看法仅仅是性快乐的工具：亲吻、调情和一夜情，将人提升到最高层次的欲望和快乐。

从时间上看，喧嚣的青春期大约在我十一岁时开始侵袭我，差不多是在被操纵选举产生的总统泽鲁阿尔时代末期，以及布特弗利卡独裁时期开始之际。这意味着那是一个从恐惧到压迫、从封闭到道德、社会甚至金融-政治腐败泛滥的过渡阶段，笼罩在巨大的谎言之下。

这样一个阶段代表着法国通过其主要工具——即穆拉迪亚宫那些不公开露面的统治者——对阿尔及利亚重新施加控制。通过“阿尔及尔之主”及其遍布阿尔及利亚土地、像破坏细胞一样的团伙，其含义不言而喻。

我喜欢通过简单的“随身听”听音乐。我开始买发蜡，定期去理发店打理头发。但在这个阶段我遇到的麻烦是父亲的封闭和固执，以及他对子女失去信任，借口是他们“懈怠”。这不是因为他坚持宗教信仰或过时、破旧的传统，更多是由于对他所谓社会形象的担忧。因此，他对我采取了威逼利诱的政策。他开始强迫我去清真寺，我被迫去了很多次，甚至在没有小净的情况下做了很多次礼拜，只为了顺从父亲可能施加的暴力，尽管我学业优异，对人彬彬有礼。

父亲甚至发展到陪我去理发店修剪我的发型。直到现在，他这种暴力行为对我的心理影响仍然很强烈，因为我认为那是对我的侮辱。他会要求理发师像对待他军队中的士兵一样剪短我的头发。因此，我恨那个理发师，他服从我父亲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觊觎那几第纳尔的理发费。

这些事件使我成为一个反抗所有类型理发的人，热爱我的长发。以至于如今我每周去理发店修剪头发边缘时，都会严格要求他锋利地修剪我的胡须，但我坚持不让他碰我的长发。有时我会付给他双倍的钱，尽管他的工作只值几第纳尔。

我仍然热爱长发，仍然计划有一天完全独立于父亲时，让头发留得很长。我仍然希望把它染成黄色。这是我青春期父亲独裁统治下产生的梦想，正是它让我每次剪发时哭泣，每次父亲扔掉我偷偷买来、藏得好好的发蜡盒时哭泣。如果被发现，我就会受到惩罚，仿佛犯了可怕的罪行。然后，这些我花了很长时间、甚至牺牲去游戏厅的机会攒钱买来的发蜡盒就会被处理掉。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父亲害怕大家庭中一些成员的嘲笑，他们过去和现在都嘲笑他和他的家庭，尽管他为他们的子女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试图取悦阿尔及利亚公众会导致疯狂，导致生活在许多矛盾之中，使家庭从内部爆炸，并造成无数丑闻和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读到子女不孝、或子女将父母遗弃街头、或疏远、甚至有些人发展到攻击父母（求主保佑）的新闻。

我青春期时的夏天，每天都会去“欧麦尔·本·哈塔卜”清真寺诵读《古兰经》。当然，与其说是出于对宗教的热爱，不如说是父亲一方面假装在教导我们伊斯兰教，试图说服自己他在履行对我们的义务，特别是因为我们的大家庭在那段时间经历了严重的财务困境；另一方面，也是让母亲在上午摆脱我们的一种手段（去清真寺）。

去那个清真寺获得的唯一好处是我记住了《黄牛章》的第一部分，并近距离了解了宗教社群。我目睹了其伊玛目“阿布·萨基亚”的虚伪，以及他如何将礼拜者视为他的客户，通过各种狡猾的手段。这使我厌恶清真寺及其所有附属者。

那些日子里最美好的时刻是星期三。父亲每周给我们五十第纳尔作为给伊玛目的捐款。但我和弟弟会逃课不去清真寺。我们去冰淇淋店买我们喜欢的口味，然后经过“阿兹丁”经营的电子游戏厅，玩耍娱乐直到孩子们从清真寺出来，然后我们拿起我们的板子回家，假装刚读完《古兰经》。

我的青春期见证了我多次试图接近女孩的尝试，无论是在我读书的初中。我仍然记得第一次亲吻班上一位女同学的情景，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到情感初体验带来的那种战栗感。

配音的墨西哥和美国电视剧磨练了我的诗意天赋。它们用美妙的戏剧场景和标准的阿拉伯语讲述爱情故事。这让我开始聆听卡塞姆·萨赫尔、阿西·哈拉尼等东方歌手的音乐，因为我觉得他们比当时在我看来更庸俗、更放荡的莱伊歌曲更贴近心灵的语言。

后来，足球吸引了我。我成为了西班牙皇家马德里（real Madrid）球队的狂热球迷，至今仍是，尽管如今对足球的痴迷不再让我感兴趣。我现在认为它浪费时间，是麻醉大众的手段。

后来，在二十世纪末，阿拉伯卫星频道加入进来。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负责打磨我的政治敏感度，而娱乐和歌唱频道，如沙特私营频道如MBC和Rotana，则玩弄我内心深处的情感。同时，MBC2频道将我引入迷人的美国电影世界，这使我与西方世界产生了紧密联系，加深了我对当时在阿尔及利亚使用尚不广泛的互联网的依恋。

如今回想我的青春期，我认为从环境角度看那是一段不寻常的时期，但从行为本质看却非常普通。我只是一个青少年，不多不少。生活在一个将青春期鲁莽视为放荡和对阿尔及利亚严苛道德体系反叛的环境中。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伴随阿尔及利亚人一生的心理缺陷。因为青春期被认为是粉碎阿尔及利亚人抱负的黄金机会，他们若以反叛应对，命运就是排挤、诽谤，成为被嘲笑和造谣的丰富材料；若以顺从和虚伪应对，则虚伪将伴随他一生，使他利用获得的每一次力量机会，通过各种手段报复阿尔及利亚社会。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即使在可怕的布特弗利卡独裁结束后，仍然无法解决。

我的舅舅们（母亲的兄弟）是传统意义上的“疯子”。他们完全在农村环境中长大，电视养育了他们。他们以阿尔及利亚方式汲取法国文化，以阿拉伯方式汲取埃及文化，以德克萨斯方式汲取美国文化。所有这些混合为我们造就了极度矛盾的人，他们不完全理解现实，是没有指南针或方向的人，在生活的每一步、无论对生活还是对他人都过于极端。

在我的外祖父艾哈迈德（愿主慈悯他）去世前，我所有的舅舅都和他住在一个房子里。我的祖母（愿主慈悯她）是家庭的管家，他们称她为“亚玛·拉拉”，意思是“我的女主人、母亲”。她负责抚养孙辈、烹饪、分发物品，甚至干预舅舅们愚蠢的妻子之间的争执。因此，那座房子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代表着一种新型冒险，我们在节日和学校假期去拜访他们时总是非常高兴。

到达我外祖父艾哈迈德（愿主慈悯他）的房子并不容易。父亲没有车，找到愿意开车送你去那个位于山丘和平原之间危险军事区域的人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一个勇敢的人来做。即使到今天，由于极度偏远，那个地区仍然难以到达。

尽管如此，我们坚持去拜访那位慈祥的外祖父。我们是外祖父小女儿（他最小的女儿）的孩子，也是他家庭的最后果实。外祖父把她嫁给了他兄弟的儿子，以保护她和她的未来。我记得很清楚，外祖父艾哈迈德（愿主慈悯他）有一些羊，他从不懈怠，每天下午都在该地区的森林里放牧，直到日落时分才回来。我会在他乡间房子附近、靠近山谷的他搭建的羊圈旁等他。一看到他，我就会跑向他，他会高兴地拥抱我，向我问好，然后总是先问起我的母亲，说："你们在这里啊，我的孩子？"

愿主慈悯你，我的外祖父，愿主慈悯你.....

外祖父艾哈迈德患上了心脏病，卧床一段时间。在与这种疾病痛苦抗争后，他在一个周二晚上去世。他的去世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失去的痛苦。随着他的离去，我失去了慈爱和骄傲的源泉。我仍然记得祖母（愿主慈悯她）在他葬礼上的眼泪。尽管她以惯常的勇敢和连敌人以及亲友都见证过的力量著称，但那天她哭泣的痛苦难以用言语形容，重复着一句话："随着他的离去，我的生命结束了，我的生命结束了。"

在我脑海中，外祖父（愿主慈悯他）的去世类似于"真主之剑"哈立德·本·瓦利德的去世。两人都因疾病和岁月的残酷而年老体衰，最终病逝于床上，此前他们都经历过毁灭性的战争。如果说哈立德·本·瓦利德的战争和英勇事迹众所周知，那么外祖父艾哈迈德（愿主慈悯他）的英勇事迹则埋藏在记忆的抽屉里，只有家庭成员和一些邻居或老友知道。

在"叛徒奥马尔"告密之后，外祖父艾哈迈德（愿主慈悯他）加入了战斗伙伴的行列，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联络和支持小组一起执行了特种行动。后来，由于另一个法国罪恶军队的叛徒走狗告密，他被捕了，发现自己身陷法国不公正监狱的深渊，遭受残酷的酷刑。

关于折磨这位英勇圣战者的方法有很多故事，但他没有屈服，没有说一个字。由于这些故事的可怕，我在此保留不叙述它们，但我可以总结他所经历的一切：有一次，他被从萨布拉（Turenne）地区的监狱转移到奥尔城马尔萨·卡比尔监狱。当然，他不是用军车或囚车

转移的，而是用一辆坦克完成的。他们将他**赤身裸体、双手反绑**，吊在那辆坦克的炮口上，沿着整个路程拖行。尽管如此，他没有屈服，没有退缩，他活着是自由的人，死去是**高贵的、可敬的人**（愿主怜悯他）。

许多阿尔及利亚人患有“**法国情结**”（le syndrome de France）。对他们来说，任何来自法国或任何法国的东西，都必然是好的或奇妙的，即使对他们有害，他们也会用尽全力捍卫法国及其相关的一切。尽管阿尔及利亚从法国得到的只有一切表面和内在的邪恶与伤害。

许多阿尔及利亚人视法国为宇宙中心、文明的象征、民主、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天堂。法国通过其诗人和作家代表**人文价值**，通过其酒吧和剧院代表高级品位。他们以恋人和渴望者的眼光看待巴黎，试图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行走，模仿法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只穿法国的东西，只看法语配音的美国电影，尽可能多地尝试说法语，攻击任何说法语时犯错的人，仿佛法国是唯一的地上天堂。甚至有些人变得比法国人自己更像法国人。

相反，也有完全相反的潮流。阿尔及利亚的另一部分人攻击法国，并将一切灾难归咎于爱丽舍宫的统治者。他们这种看法部分是合理的，但他们往往过于夸大。例如，即使阿尔及利亚阿德拉尔省的一头驴绊倒了，他们也会说这是由于巴黎针对阿尔及利亚及其人民的**邪恶计划**。

对我来说：

法国不是宇宙中心，法语和其他语言一样。我像其他阿尔及利亚人一样，失去了宝贵的时间学习它，因此我不希望我的努力付诸东流，所以我用法语出版了第一本书，书名为：《阿尔及利亚世界（le monde algérien）》。但这并不妨碍我谴责法国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可能存在的针对阿尔及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人的罪恶政策。

至于法国人民，他们和其他民族一样，有**好人也有坏人**。但法国人的普遍情绪是将阿尔及利亚人视为“**原住民**”，**原因因人而异**。我不得不承认，他们中的一些人曾支持阿尔及利亚革命反对法国军队本身，存在主义作家和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

我必须承认法国是一个大国，因为其军事和经济实力。但我不能忘记，法国力量的来源是其对非洲大陆（包括阿尔及利亚）**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掠夺**。

法国文化纯粹是天主教文化，尽管它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很大程度上民主的共和国。然而，其政策在这一领域仍然矛盾，因为它支持世界各地的独裁政权。

不能否认法国之手对阿尔及利亚犯下的、任何有良知者都不会忽视的罪行。任何正直的阿尔及利亚人都会忘记，巴黎君主制倒台后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规定阿尔及利亚是法国土地。这是不正确的，违反了法国国家本身所高举的最高价值观。

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希望生活在法国。我可能会多次访问它，多次参观埃菲尔铁塔，因为它是由阿尔及利亚的铁和非洲（包括当时属于阿尔及利亚的）劳动力建造的，这些劳动力被强行带到法国土地上奴役，并遭受各种不公正待遇以建设法国城市。因此，我有权漫步在法国街头，因为它们不仅仅是法国人的财产，也是整个非洲大陆的财产。法国人只是这些财产的篡夺者，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将其归还给合法所有者。让我告诉你们，它迟早会归还的，或早或晚，时间将是我们之间的仲裁者。

看到非洲青年（包括阿尔及利亚青年）在法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前排起长队，希望获得进入法国领土的签证，令人痛心。法国将他们视为十等公民，受其统治的法国政府善于并持续使其祖先和他们自己陷入贫困，通过支持掠夺他们国家资源、将资源交给法国以换取沾满鲜血和屈辱的残羹剩饭的屠夫们。

我无法爱法国，也无法恨它，原因很简单：我是阿尔及利亚的贵族。贵族无法爱一个压迫其祖先的国家，也无法因为一群流氓对其圣物和人民所犯的 error 和罪行而恨一个国家。对我来说，法国人的水平不够高，无论是道德上还是文化上，都不配得到我的爱或恨。

我以一种奇怪而喧嚣的方式度过了高中阶段（le lycée）。它与我生活中多变的事件同时发生。但今天，当我回忆那段时期时，我发现那是我整个生活中一段失败和真正考验的时期，是塑造我内心男子汉的阶段，并以精彩的方式磨练了他，直到他完全成熟。

在我进入高中前一年，父亲为我们购买了一栋在建的房子，位于萨布拉（Turenne）地区，他自己设法筹措了一半的钱，剩下的部分是通过祖母（父亲的母亲，愿主慈悯她）的关系，向他的舅舅穆罕默德（愿主慈悯他）借的。那是二十一世纪的美好开端。

我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初中毕业会考（BEF），然后希望继续在高中取得优异成绩。因此我选择了普通科学班，但我并没有太在意这个选择。我的物理和自然科学成绩优异，数学成绩中等，尽管我特别喜欢这门课。

父亲也获得了在萨布拉以外地区工作的机会，确切地是在巴布·阿萨地区。由于新职位的特权，他获得了使用职务住房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必须搬到那个地区居住。与此同时，祖母（父亲的母亲，愿主怜悯她）和牙医叔叔在我们离开后，受到了房东（前法国线人）的严重不公对待。因此，父亲竭尽全力，设法将他们搬到了他购买的新房子里。他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装修行动，最终成功将他们搬进了新家——当然，新家还需要很多修理——但适合居住，远离房东的烦恼。

我们确实搬到了那个我以前完全不了解的地区。我身后留下了一段漫长而充满苦难和悲剧的历史。终于，我们在城市中心有了自己的独立房子。虽然远离所有人，但对我们来说将是舒适的，远离来访妇女的闲言碎语和无论我们搬到哪里都会追随我们的社会问题，这都是由于母亲的天真，她分不清诡计和善意。这基本上源于她至今仍未改变的纯洁意图和纯真。

那个夏天过后，我进入了巴布·阿萨混合高中。这所高中完全按照部落法则运行，根据学生的部落种族归属来评价他们，远离任何智力或科学标准。

新的同学，我不说他们的口音，很明显我是他们中的陌生人。我年纪小，充满了青春期的躁动想法。在那所高中的院子里，我遇到了思想和思维模式的可怕混杂。例如，来自“萨瓦尼”地区的人和来自“本·迈希迪港”来上学的人之间，生活方式差异巨大，简直是光年之别。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些从未经历过流血十年的人之中。那段恐怖时期的所有故事，有些人不相信，对另一些人来说像是虚构的，或美国电影的剧本，仿佛他们生活在瑞士而不是阿尔及利亚。

他们唯一的关注点是日收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夜间收入。他们中的大多数从事走私活动，往来于摩洛哥边境。他们的年轻人分裂为虔诚朝觐者和享受各种生活乐趣者之间。钱的问题解决了。夏天，他们都移民到本·迈希迪港的海滩，那里鱼龙混杂，仿佛我们在欧洲或加利福尼亚的某个海滩上。这是一个从未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世界。年轻人心理平衡

，尽管他们以极其落后的方式固守着拼凑的传统，但心理上却远离我们这些经历了漫长流血十年的人。

新的老师，新的制度，新的问题摆在我面前。由于我是该地区的陌生人，我成了阿尔及利亚教师对学生施加心理压力的容易目标。由于当时的鲁莽胡闹和对局势的糟糕处理，我在短时间内成了学校内骚乱的标志性人物。

我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三年，直到我第一次高中毕业会考失败。我崩溃了，为失去的学业荣耀感到遗憾，就像之前被剥夺的童年和被绑架的青春一样。

在那几年里，我们每年夏天都会定期去海滩。这促使父亲为我争取临时工作，这些工作非常累人。那些日子，我在本·迈希迪港的海滩上工作时经历了无尽的艰辛。我很难找到休息时间，更不用说睡觉的地方了，而解决吃饭、洗澡和洗衣服的费用来源则更加困难。那是相当艰难的生活。父亲的目标是让我被生活“咬一口”，从而知道学习的价值。而我却在那段时期找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随心所欲地搭讪女孩，在海滩上闲逛度过闲暇时光，对这个微笑，和那个调情，与另一个女孩赢得夜间约会。约会在冰淇淋店的椅子上开始，在地中海的海浪中、在一连串的亲吻中结束。我不否认，在那个时期，在那个地区的核心地带，我完全学会了性行为，尽管周围遍布着父亲那些正直熟人的眼睛。一句话：那时我成了一个彻底的反叛者。

本·迈希迪港的海滩教会了我如何满怀激情地驾驭生活，以至于我开始憎恨夏天的结束，因为那个季节是属于我的季节。我忍受整个学年的父亲的烦恼和抱怨，以及他的愤怒，艰难地结束学年，然后前往“赛港”度过我真正的时间，仿佛我的生命之钟只在夏天运转。

在我第一次高中毕业会考失败的那个学年夏天，大家庭决定庆祝我的牙医叔叔的婚礼。这对我来说是个不幸的消息，因为婚礼将在夏天举行，这意味着一方面我将失去惯常的夏日乐趣，另一方面我将遇到大家庭中所有“邪恶面孔”，他们会在整个庆祝期间把我作为嘲笑和奚落的对象，这将让我付出高昂的精神代价。为了我的兄弟和牙医叔叔，我必须承受这一切，因为那是他一生的喜事，尽管对我来说，它只不过是一场阿尔及利亚式婚礼。

那一年，我成了各种嘲笑和侮辱的美味佳肴。我相对较长的头发，我的夏季短装，以及我开始改变的行为举止。我不再是那个天真的农村孩子，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语言、行为

、品味，以及最重要的是，区别于周围所有野蛮人的方式的青少年。这无法满足我们大家庭中贵族阶层的期望，他们忘记了所有这一切，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我的外表和形象一方面，以及我高考失败的故事另一方面，甚至连那些教育水平未超过小学的人也来嘲笑。说句公道话：我们大家庭包含了大量工程师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尽管如此，无论那时还是现在，任何人都无权侵犯我的私生活.....让他们见鬼去吧。

在整个婚礼期间，我使用了无视和假装漠不关心的策略。这使我成为一个沉默的火山，不显于外。然而，这种方法让那些嘲笑我的人怒不可遏，增加了他们嘲笑我的比例。我将注意力集中在当时的志愿工作上，而那些试图通过参加婚礼来"钓"丈夫的女孩们成了我的发泄口。我赢得了一些女孩的电话号码，邀请她们来本·迈希迪港海滩时联系我。尽管来自家庭的疲惫和心理痛苦，但我为牙医叔叔的婚礼感到高兴。他值得所有的幸福，尤其值得我所有的耐心，以免破坏他的喜悦。

那场婚礼在大家庭的普遍喧闹下进行。那是我母亲与多年前袭击她的人第一次见面。经过艰难的谈判，父亲成功说服母亲避免与那只犯罪的"猫头鹰"交谈。事实和言语上都做到了这一点。母亲出于对牙医叔叔的尊重，没有在他的大喜日子里制造麻烦。

在阿尔及利亚方式下结婚并不意味着你有权选择你的新娘，而是你必须接受家庭为你选择的人。也许在特殊情况下你拥有否决权。我的叔叔当然由祖母（愿主慈悯她）为他选择了新娘，他没有拒绝。新娘是亲戚，年轻，有大学学历，家庭有名望：她的父亲是祖母（愿主慈悯他们俩）的侄子。而我的叔叔是一个无法拒绝的新郎，因为他具备重要条件：他是一名牙医，这意味着是金矿和一本敞开的支票簿；他（至少表面上）虔诚；最重要的是，他能够在经济上保护家庭，且不以风流闻名。所有这些条件都是对第一个条件的补充。至于新娘的条件，只需祖母（父亲的母亲，也是新郎的母亲）同意就足够了，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那场婚礼平安度过。我回到了海滩，失去了很多神经，同时赢得了与大家庭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切断了与他们最后的联系。但我赢得了一部手机和许多女孩的电话号码。

那些电话号码只结出了一个果：与其中一位女孩的一次短暂约会。她是一个极其富有的父亲的娇惯女儿。她来到本·迈希迪港时联系了我，让我在一家餐厅的皇家套间与她见面——当然，账单对我而言很沉重——但这一切都值得，因为约会以步行、手牵手走向"莫斯科达1号"海滩而告终，并以亲密的时刻结束，其间还夹杂着对在沙滩上抓捕情侣的巡逻警察的恐惧。她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孩，她双唇美妙的滋味至今仍在我内心深处回荡。遗憾

的是，那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生活就是这样，给予我们无价且不可重复的时刻。

我与信息学 (l'informatique) 的关系可以说有些年头了，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时我们街区开了一家网吧，每小时的价格很贵，而网速却比乌龟还慢。但我以惊人的耐力承受了精神（耐心）和物质（金钱）成本，只为获得一个电子邮件地址。我为这一成就感到无比高兴。

当我连续几年高考失败，家庭因此承受的社会压力增加——来自大家庭中邪恶之人的嘲笑和一些心怀恶意者——父亲注意到，他对我的愤怒、不断的抱怨、扰乱我的日常生活，甚至每个夏天加诸我身上的苦难（在他看来）都没有奏效。相反，这使我变成了一个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的人，以至于在他看来，我已经习惯了失败。这让他无限疯狂。于是他脑海中闪过一个“高明”的主意：试图摆脱我和高考这件事。他把我注册到了“曼苏拉”专业学院，我当然选择了信息学专业，因为我和它早有渊源。那时MSN和雅虎聊天室正流行。这个计划对我们俩来说都很满意：父亲摆脱了我，我摆脱了他不断的抱怨和那些像战争中的火流星一样落在我灵魂上的伤人话语。

我的生活相对发生了变化。我成了一名职业培训和学徒制的学员，住在一间像监狱牢房一样的房间里，与那些被高考之剑斩首的弃儿们分享食物、房间、愿望甚至苦难。老师们对待我们近乎蔑视，管理部门把我们当奴隶对待，而那所机构的工人们看我们就像对待应该受惩罚的罪犯或应该提防的囚犯。为历史作证：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成为了相当程度上“善良的野蛮人”。

我开始近乎憎恨学习。我只在上午上课，下午不去。之后我认识了一些女孩和一些男孩，我们组成了一个玩乐、嬉戏、闲逛和经常扮演恋人角色的团队。夏天，我照常在本·迈希迪港的海滩上度过，追逐梦想，实践我受苦和“钓”情人的爱好。但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妙的三年。

在此期间，“邪恶面孔”们牢固地认为我是失败的典范。他们中的一些人厌倦了嘲笑我，因为我的言辞变得犀利，而且我了解他们每个人的缺点。另一些人则建议甚至禁止他们的子女与我接触。我们的老邻居“警察穆罕默德叔叔”对我终身朋友瓦利德的做法，就是那种情况最清晰的写照。

我不再关心任何人。我的时间分配在假装学习、与某个女孩玩乐，以及尽可能长时间待在家庭之外以避免与父亲接触——在那段时期，他像坚持做礼拜一样执着地伤害我的感情。而我的母亲则在文火上煎熬。我能感受到她埋藏的痛苦，但我内心开始变得刚硬。也许那时，由于我在其中熔炼的残酷，我开始失去对他人的感受，甚至对我亲爱的母亲也是如此。这使我接受了被遗弃的野蛮人、反抗一切价值的反叛者的角色，开始做所有被禁止的事：偷窃、撒谎、购买毒品（不是自己用，而是给某个坏同伴），甚至和其中一人一起去了特莱姆森省唯一一家卖酒的小店。我成了头号花花公子，不分美丑。我当时的座右铭是：每个女孩都适合度过一夜或两夜，如果条件不允许，那就一个或两个吻，视地点条件和时间要求而定。

我从学院毕业的那一年，对我来说是划分两个时代的分水岭。那年夏天，父亲决定将家庭搬回萨布拉（Turenne）地区，确切地说，是我们之前购买的新房子。因为牙医叔叔结婚后，和他以及祖母（父亲的母亲，愿主怜悯她）搬到了他们自己的房子，我们的房子就空了出来。因此，父亲利用时间进行了修缮，使其适合居住。最终，它变得良好，适合重新容纳家庭。

母亲负责将这个消息带给我，但我当时并不太在意。尽管父亲的新计划会像往常一样，长时间剥夺我在本·迈希迪港海滩的玩乐和“磨炼”，但我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因为我知道作为一个独立于大家庭、住自己房子里的家庭意味着什么。在那里我将是自由的，仅仅关上我小房间的门就足以让我与“邪恶面孔”们隔绝。

那一年也是多事之秋。除了搬新家的计划，我们还必须为另一个项目奔走：我大姐的婚礼。这下可乱套了，我不可避免地要见到那些“邪恶面孔”，他们也会是受邀者。尽管如此，我并不太在意这件事！

我们开始将物品从父亲的职务住房搬到新家。这是一个令人疲惫的过程，充满了矛盾的情感。你在告别生命中的一段时光和一个地方，那里留下了各种精神互动——欢乐或悲伤——的时刻，然后走向完全未知的未来。但整个过程对我来说只意味着强加给我和弟弟的疲惫：一方面搬运物品，另一方面准备婚礼，第三方面还要照看建筑工——卡迈勒·格沙什。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在我不起弟弟的帮助下，我成功地完成了。那年在南非举行的世界杯比赛补偿了我们。有时，对足球的痴迷有助于我们逃避悲惨现实的残酷。

还有一些物品留在父亲的职务住房里，主要是冰箱和其他一些东西。父亲想用一辆小型卡车把它们运过来。那天吃完午饭后，父亲告诉我：“我去做晌礼，然后我们就出发去巴布·阿萨，把剩下的东西拿回来。准备好！”

事情确实如此。我们坐上那辆卡车，往返路程各超过一百公里。

天气极其炎热。我穿着一件白色背心和一条很短的短裤。父亲一路上都在和司机聊天，我完全不理他们，利用时间从车窗看风景。

时间过得很慢。我们到达巴布·阿萨，装载了父亲想带走的所有物品，然后启程返回。在路上，我的手机响了。父亲恼怒地看了我一眼，因为他以为是某个女孩打来的。当我慢慢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时，我助长了他的怀疑。我看着来电显示，是我的一位同学，然后又把手机放回口袋。但铃声持续了很长时间……我的同学不放弃，而我所在的环境不方便接电话。我被四个“雷达”包围着：父亲两个，那个寄生司机两个。

当我们到达“本·卡拉马”地区时，司机靠边停车，以为有什么东西从物品中掉落了。我们都下了车，他和父亲在路两边寻找掉下的东西。而我则利用那几分钟和我的同学通话。他告诉我一个意外的消息：高考成绩已经公布并宣布了，因此我们今年有可能成功，毕竟我们曾一起为这次考试努力准备过。

我们很快回到车上。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感觉不到剩下的路程。高考的“电影”开始在我脑海中、从我眼前放映。几年来作为高年级学生，辗转于巴布·阿萨混合高中和布齐迪·穆赫塔尔高中，以及作为自由考生参加考试的那些年，全都指向一个命运：失败。我要给我的失败再加上一年吗？还是我终于能进入梦寐以求的大学殿堂？

我们快速卸下物品。我发现家里有一些客人，周围响起了欢呼声，庆祝高考成功。我的大姐想起我今年也参加了考试，冲过来问我。但我回答说我没有发送我的号码，还不知道结果。她对我说她手机里还有余额，我只需要给她我的注册号，她就能查出结果。我的心跳加速，但我以极大的镇定和冷静保持了镇静。几分钟后，她告诉我我通过了高考。我不相信，告诉她她肯定弄错了。但她把手机递给我确认，我完全确定了。是的，我通过了高中毕业会考。这是我的全名，下面是可接受的分数。是的，我通过了。于是我的大姐跑去告诉所有家庭成员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而我弟弟则负责告诉父亲。

啊！

那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时刻。我一生中第二次看到父亲哭泣，但这次是因为巨大的喜悦。他拥抱着我说："愿主保佑你，我的儿子！"他重复了很多次。而我亲爱的母亲不敢相信这个消息，反复问我。当喧嚣平息，我独自坐下时，我又用我自己的手机确认了一次结果。通过姐姐的手机和父亲的手机做的所有那些确认都不足以让我相信。是的，我通过了，事情已成定局。我将进入大学继续我的学业。我在家庭中的地位变得更加强大。终于，我是一个成功者（winner），不再是一个失败者（looser）。一个幸福时代的轮廓开始显现。出于极度的喜悦，我去了城里的理发店，把我的头发完全剃光，作为对这个伟大胜利的庄严感恩仪式献给了上天。

在青春期，特别是在高中阶段，帮助塑造我性格的是我经常光顾的一家小店，它像是一个游戏厅（la salle de jeux），由一位名叫阿卜杜勒·瓦哈卜·穆巴拉克、绰号"阿卜杜"的阿尔及利亚年轻人经营。

我几乎每天都坚持去那个游戏厅。尽管父亲坚决反对，祖母（父亲的母亲）也厌恶这种行为，但电子游戏在当时是我长久以来享受最美好时光的天堂。和像我一样"鲁莽"的年轻人在一起，我在那个地方建立了美好的友谊，尽管是短暂的，但其事件至今仍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高考成功后，我愉快地度过了大姐的婚礼，非常享受地看着大家庭中的"邪恶面孔"们在我面前强忍怒火。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谄媚方面做得过火，跑来祝贺我这个"迟来"的成功，试图贬低我的成就。而另一些人则试图完全忽略这个话题。而我则对此感到自在。

我大学的旅程在大姐婚礼仅一周后就开始了，从大学注册阶段开始。我争分夺秒，想抢夺那个我梦寐以求、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教学席位。这促使我咨询了大家庭中的一些人，希望他们能帮助我选择适合的大学专业。我曾以为他们中有些人怀有善意。然而，我发现他们是最恨我的人，这从他们所有人的慌乱中可以看出，无一例外。这反映在他们的言辞中：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拒绝了我的请求，理由因人而异。那么！我别无选择，只能拿起时光的剪刀，剪断我与大家庭之间的最后一根纽带。怨恨是同一的，尽管面具不同。我再次求助于自己，决定依靠自己。毕竟，是我独自一人成功通过了高中，我也将独自一人通过大学。

此外，那个夏天是切断与过去联系的重要分界点。我开始自我隔离，决定成为一个新的、严肃的、能够承担责任的人。我已经开始独立选择将在大学学习的专业。

我选择了"社会科学"专业，第一年公共基础课。不幸的是，我大姑姑那个被宠坏的儿子"阿齐兹"那年也通过了考试。于是，在童年陪伴的阴影下，他试图和我一起进入这个专业，陪我穿梭于大学的各个院系和办公室，最终如愿以偿。

我的大学旅程开始了。我现在是"阿布·巴克尔-特莱姆森"大学的一年级学生，人文与社会科学专业，LMD学制。我是一个非常勤奋、认真的学生，不知道鲁莽和轻率为何物。我关上了手机，拒绝恋爱关系，断绝了与那些我曾与之闲逛的人的联系，完全忘记了阿卜杜的游戏厅。

我从大学第一年就设定了一个目标：取得优异成绩，我只接受年级第一的位置。这促使我白天去大学，晚上总结课程和所有知识，睡觉时手里也拿着书，试图阅读和总结。简而言之：我恢复了小学时那个勤奋学生的性格，只想成为第一名。

一周很快过去，我在学习和阅读中度过。但每个周末的休息日，我有另一个约会：从事农业劳动，帮助父亲在我们的农场或新家里进行一些维修。日子就这样飞速流逝，我发现自己通过了考试，并理所当然地获得了第一名。在第一学年结束前，我成为了年级和老师中的明星，一方面因为我激烈且信息丰富的辩论，另一方面也因为我总是出现在教室和阶梯教室里。

"当他看见太阳升起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主；这是更大的。’当太阳没落的时候，他说：‘我的宗族啊！我对于你们所用来配主的事物，是无关系的。’"（《古兰经》6:78）

这节尊贵的经文为我概括了在大学度过的五年时光。在那艰苦的岁月中，我在第二年选择了学习哲学专业（la philosophie），也许是追随不同时代伟大哲学家的脚步。环境和植根于我的挑战特质，是推动我走向这一学术方向的决定性因素，它既艰苦又令人愉悦。

在四个专业中：心理学、社会学、人口学和哲学，我选择成为一名哲学家（un philosophe）。因此，我用"哲学家"这个词装饰我在社交媒体上的个人页面。这是我通过无数个夜晚付出努力、时间甚至金钱所收获的甜蜜而苦涩的果实，以达到我的目标并成为我所在年级的佼佼者。简而言之：成为一名哲学家。

哲学专业的第一学期在一个紧张的环境中开始。当时我们遇到了古典学制最后一批学士学位学生的问题。一位大学教练误导了一些可怜的学生，让他们相信一个悲惨的命运，并鼓励他们通过示威和静坐进行骚乱。他们最主要的要求是：将他们并入LMD学制。而他则在当时的傲慢哲学系主任被推翻后获得了一个行政职位。这确实发生了。根据部长决定，这些学生被合并了，这意味着即使他们不闹事，他们也会依法被合并。而那位狡猾的教练则占据了他想要的职位。最大的输家是那位被调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大学院系的傲慢系主任。加速这些步骤的是，这些事件与当时突尼斯和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开始时间重合，因此整个事件带上了某种政治色彩。

在所有这些喧嚣中，我失去了在哲学专业第一学期获得第一名的机会。一位我向真主作证她非常勤奋的女同学获得了第一，我第二。这位可敬的女同学促使我在第二学期付出了双倍的努力，以确保第一和第二学期的综合第一名。正如我所要求的那样，我需要超越所有人，特别是那位女同学，并保持巨大优势，以确保稳坐二年级第一名的宝座，不受干扰。

第二学期我在紧张中度过。我对阅读的热情增加了，辩论能力也提高了。我标准的阿拉伯语（在我的男女同学中）、加上我精通法语和英语（尤其是英语），增加了达到我目标的几率。确实，那年学年结束时，我以巨大优势——甚至我自己都没想到——稳坐哲学专业二年级第一名的宝座。

我在社会科学和哲学学习初期——即大学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特点是，我发现了自己撰写和在网上发表文章的能力。这促使我发表了第一篇题为《自由》的文章。之后，我的文章陆续发表在博客页面、论坛，有时当我的文章装饰着某家电子杂志的页面时，我会欣喜若狂，特别是《阿拉伯思想》杂志、《呼吸》杂志、《阿尔及利亚新闻报》……等等。

渐渐地，“学生-年级第一”的形象开始在我面前成形。这给我带来了一些仰慕者，很多嫉妒者和好奇者，以及一群嫉妒的仇恨者。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都迫不及待地等着我犯错，因为阿尔及利亚群体憎恨偶像，并且阿尔及利亚人总是与纳粹宣传将军结盟，憎恨知识分子，口号是：“每当我听到‘知识分子’这个词，我就伸手摸枪。”但对我来说：我的地位越来越闪耀，它的光彩开始让我感到额外的压力，因为保持顶峰并不像到达顶峰那样，在这条凯旋的道路上，保持顶峰更加困难。

我的生活变得多样化：每个周末，在整个四个学期中，我撰写哲学文章，有时是文学文章，并在网上发表；去大学；阅读哲学书籍和研究；深入学习外语，如英语、法语和德语。我激烈的辩论使我看起来像一个狡猾的骗子，攫取信息并以古代诡辩家的方式编织哲学语境。这使我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

大学三年级让我专注于撰写学士学位毕业论文。我选择了马利克·本·纳比（被驱逐的阿尔及利亚哲学家）作为我的研究领域。我开始像任何研究者一样收集原始资料，他的书籍以及与他生活相关的一切成了我占据所有时间、精力和思考的工作领域。

文化问题作为研究领域吸引了我。马利克·本·纳比的法语著作《文化问题》为我指引了严肃研究的道路。我试图在马利克·本·纳比、文化研究和保持年级第一名之间创造一种平衡。确实，我在学年结束时实现了所有这一切。现在轮到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经过所有这些努力和自律，我发现自己又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我必须在硕士阶段选择一个项目，成为一名学生。我有两个选择：伊斯兰哲学与苏菲主义，以及哲学与文化多样性。

当然，我选择了第二个标题，原因有二：第一，我在学士阶段研究过它，文化主题极大地吸引了我，源于阿尔及利亚自其土地从法国殖民统治下独立以来所经历的文化危机。我重申：是其土地从法国殖民统治下独立。第二个原因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一个专业的伪君子，他以严肃研究员的面貌欺骗了我，声称致力于建设纯粹的阿尔及利亚哲学项目。但后来发现，他不过是一个腐败的雇佣兵，要不是布特弗利卡独裁政权，他不可能获得大学教练的职位。

像自从进入大学生活以来的习惯一样，我更加严格地工作以保持第一名，尽管压力巨大，但我还是做到了。因为成为阿尔及利亚人中的偶像意味着你面临许多指控，这使你容易受到辱骂、诽谤甚至监视和追踪。你必须为你的学业优异这一“罪行”付出代价。

哲学与文化多样性硕士项目的第一年我取得了成功，当之无愧地获得了第一名，并扩展了我的学术研究。实际上，我远远超出了这一步，参与了国内和国际研讨会。我的参与和对受邀的阿拉伯和法国研究人员的讨论常常招致评论，尤其是我用流利的法语向法国人提出的那些问题，使我成为特莱姆森大学整个哲学系的焦点。

在那个阶段我没有注意到的是，在硕士项目的第二年，我在信息量、谈话方式甚至对思想构建方法的掌握上，已经超越了那些不久前还声称在教导和指导我的人。实际上，每个大学教练都避免与我讨论，原因有二：一是害怕可能伴随他一生的潜在丑闻；二是除了穆罕默德·舒基·津博士（我仍然认为他是唯一真正配得上“教授”这个头衔的人）之外，我遇到的所有大学教练都很薄弱。

硕士阶段像往常一样以我的优异成绩结束，获得了一纸文凭，时间后来证明它甚至不值书写它的墨水钱。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自己像每个阿尔及利亚失业者一样流落街头，无权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因为我未能通过进入博士项目的选拔考试，仿佛我从未学习、从未努力、从未优秀过一样。简而言之：这就是阿尔及利亚丛林。

我的大学生活是一段承受着可怕压力的时期。但我喜欢上英语课，因为那位名叫伊克拉姆的女教练使那些课变得非常精彩。她有能力跟上时代，并利用当代资源将我们带入与我们时代同步的语境中。这使我对那位女性极为尊重。

要从阿尔及利亚大学走出来，同时保持镇定和前进的决心，并不容易，但我努力做到了。

在失去继续深造机会一个月后，我得以重回现实，祖先的农场（愿主怜悯他们）再次成为我的方向。我试图开办一个小项目，直到父亲（愿主保佑他）的帮助才使我走上正轨。当时他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予了我全力支持。确实，我成功地成为了一名家禽饲养员！

五年的优异学业和在书籍扉页、图书馆堡垒间钻研、在大学走廊里奔波的时光，最终让我落脚成为一名家禽饲养员。我对此一无所知，除了用不完的勇气（这在这样的领域毫无用处）外，我一无所有。

在这段时间我受了很多苦。每天我必须步行超过两公里才能到达农场，回程也一样，这还不算我喂养小鸡所需付出的努力：水、食物、通风，甚至清理周围致命的细菌。无论何种标准衡量，这都是一场悲剧。

我以这种状态度过了几个月，一种无与伦比的忧郁笼罩了我，使我完全与人隔绝。我的日子在阅读书籍、工作及其问题，以及每天走过的那些给我带来疲惫的距离之间交替。直到新的一天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有一天，我接到禽苗供应商的电话，我已经为接收这些小鸡准备好了地方。我出去找我的货，一个未保存的号码打到了我的手机上。由于我正在等待兽医的电话，一看到那个未知号码，我立刻就回拨了过去。结果令人惊喜。

电话来自地区教育监察局。来电者坚持要我立刻去他们那里。由于他的坚持和强调，我害怕那些幸福的时刻会在我面前爆炸。我立刻改变了路线前往他们的中心。一进去，他们就把我的任命书交给了我。然后行政监察长在他的私人办公室接待了我。当时有两个人和他坐在一起，后来我知道他们是两所学校的校长。他开始向我讲述工作条件，并强调我要遵守一些义务。然后他指引我到隔壁办公室完成行政手续。做完这一切，我签署了很多文件后拿到了我的文件。我正要离开，在门口遇到了在办公室见过的一位校长。他对我说：“孩子，以后别穿这样的短裤来这个办公室了，因为你的新校长不想和你一起工作。要不是认识你父亲的监察长坚持，你就失去这个职位了。别告诉任何人，只是个建议。”然后我们各走各路。

任命地点是一个完全偏远的地区，名叫“沙里亚”。那里唯一的政府建筑就是学校。居民是农民，甚至交通也不便利，只有一些非法运营的汽车。那地方安静而荒凉，仿佛我去了阿尔及利亚深部的最深处。学校很小，校长完全“文盲”，女教师们水平一般，她们的心因怨恨和嫉妒而黑暗，除了一位和我年纪相仿的女教师，她是新手，因此我从她那里得到了一些善待。而我必须每天给学生们上课，为期整整一个月，也许还要延长一个月。又是一场条件同样恶劣的新冒险。

我在那所学校度过了整整两个月，期间在教学中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小学低年级学生的教学经验。所有老师都一致认为这是最困难的阶段，也是最神圣的职业之一。

那段时期结束后，我又一次失业了。我仓促地放弃了建立的家禽养殖项目。之后，我发现自己回到了起点。父亲建议我们进入商业领域，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们共同开了一家“书店”，销售书籍和学习用品。我们在办理政府手续以获得商业登记证时，饱受官僚主义之苦，还有贪婪的店铺房东。卑鄙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一个人。

我成了一家书店的老板，整天待在那个地方，置身于书籍之中。我通过给一些路人充手机话费赚取一些第纳尔，并与一些我过去认为是朋友的熟人聊天取乐。在这里**我学到了非常重要的教训**，最重要的是：阿尔及利亚公众屈服于通过幻想运作的软性权力。每个阿尔及利亚人内心都住着一个自己并不具备美德的道德卫士。每个阿尔及利亚人一旦感觉你软弱，就会密切关注你的踪迹，等待你跌倒，然后享受践踏你、听你呻吟的乐趣。

和其他项目一样，这是一个失败的项目。地理位置不利，处于该地区一个被边缘化的角落；阿尔及利亚人的文化也不支持阅读和追踪书籍与作者，尽管我的书店包含了主要作家和研究者的重要著作和词典。尽管如此，我还是关上了书店的门，转向了一份全新的、我完全没有经验的工作。

像许多持有阿尔及利亚大学文凭的人一样，在我失业期间，大多数心怀恶意和嫉妒的人都幸灾乐祸。他们是我无论何种工作、无论何地都努力寻找工作的动力。

经过这场巨大的马拉松，我最终在一家五星级酒店找到了一份简单员工的工作。我仍然记得人力资源部门接收我档案的负责人送我离开时说的话："欢迎来到阿尔及利亚（**bienvenue en Algérie**）。"

在酒店的工作让我知道了阿尔及利亚大学文凭的价值。我成了一名和其他从未上过学的人一样的员工。我和每个学业失败的人处于同一水平。事实上，我们的直接主管甚至没上过高中，而那个部门的负责人一生从未进过大学，她的副手更是与所谓的教育水平相去甚远。

那份工作的好处是，由于我精通英语和法语等西方语言，我赢得了那里大多数工人的尊重。一个能与管理整个酒店的法国人、或接替他职位的意大利人交谈的员工，被认为是超常的员工。一个如果你不赢得他的好感，他就有可能编织阴谋让你被解雇的员工。因此，一些工人出于恐惧而害怕我，另一些人则因为我是知识分子而尊重我。而从实践角度看，工作却是地狱，因为阴谋众多，需要每天、全天保持高度警惕。

那个地方（酒店）的客人都是社会地位显赫的人物：大使、部长、商人和其他富人和知名人士，还有一些收入有限的人，他们过去和现在都只为了和情人幽会而光顾这些地方，为了短暂的快乐而承受高昂的费用。

在酒店工作一个月后，我得以在员工翼楼获得一个房间。我开始认真工作，并在那里近距离认识了腐败，以及金钱如何改变灵魂，就像丘吉尔与出租车司机的著名故事一样。有了钱，即使你是文盲，你也能受到尊重。阿尔及利亚人谄媚富有的文盲，却鄙视学者、思想家、知识分子和穷人。

由于我的工作和与许多国籍的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甚至美国人——的交流，我看到了阿尔及利亚人与这些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并亲身经历了在“烈士之地”未曾见过的场景。实际上，我亲眼目睹了马利克·本·纳比所说的“可被殖民性”。我接触到的每个阿尔及利亚同事，我都能在他身上感受到可怕的可奴役性。我近距离目睹了一些人对一切法国事物的奴性，即使这对他们有害。这些事实确实让我感到不安，但我宁愿接受苦涩的真相，也不要甜蜜的幻想。

面对这些隐藏的屈辱表现，我开始寻找另一份工作。我不是一个通过虚伪和谄媚往上爬的伪君子，也不是法国人或任何人的奴隶。我认为自己和他们是完全平等的人，处于同一水平，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比他们更优秀。因此，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离开。

与此同时，我参加了公务员考试，以争取一个职位，确切地是在国家教育部。经过多次失败，整整一年后，好消息来了：我的名字出现在了小学教师的名单上。感谢真主！

我向酒店管理层提交了辞职信，此前我经历了几天睡眠不足的日子：晚上十一点开始工作，早上七点结束，然后去“达利亚”区的教师培训中心，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两点半，然后回到酒店房间等待工作时间并稍作休息。

经过几天的这种紧张节奏，我提交了辞职信，但遭到了拒绝。理由是我是个积极且有能力的员工，机构不应失去我的服务。尽管如此，我一再坚持，但又被拒绝了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最终，我不得不彻底放弃工作，因为我和机构的合同已经到期，我还没有签署新合同，因此我合法地摆脱了他们。仅仅一个月后，我进入了教育部门。我在那里度过了

整整一年，等待督学的视察，而督学直到第二年才来视察我。那年，我作为小学教师被正式录用。感谢真主无尽的恩典。

在大学毕业前后直到我成为"小学教师"期间，我采取了一个总是给我带来巨大社会压力的步骤：我去向一位居住在"鸽子"地区的女孩求婚。她确实等了我一段时间，和我一起经历了艰难的条件。但命运的讽刺是，当我们的物质条件改善时，我们通过协商结束了我们的关系。我回到了我作为阿尔及利亚独行者的道路，而她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我祝愿她一切顺利和正确。

在这个阶段，我试图在经营书店的同时（我之前解释过其情况）建立一个小型工作项目。它涉及与一个懒惰的穷人合伙开一家快餐店。他过去常坐在我的书店里抱怨失业，我决定和他合伙做这个小项目，让我们俩都受益。但一个名叫易卜拉欣的第三方扮演了挑拨离间的角色，导致那次合伙以灾难告终，失去了合伙人和项目。

在我生命中留下美好印象的人物是我的小妹妹，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我非常爱她，她是那个从未伤害过我的人，哪怕是出于无心。她专注地听我说话，并大胆地与我讨论。她通过理科高中会考后，在大学学习阿拉伯文学。尽管她已长大成人，甚至成了一个热爱生活、梦想去伊斯坦布尔定居的年轻女性，但我仍然视她为小女孩，那个从未打扰过我、总是远离他人、只关心自己事情的小女孩。

在一个周末的日子，我和父亲在农场里——像往常一样，我和他一起干了一上午艰苦的农活，在烈日下，加上交通不便和整个事情的疲惫。突然，我们看到我的出租车司机叔叔也来参观他的农场。那是一块毗邻我父亲土地的土地，我们姑且称之为农场。他和我们打招呼，和我父亲交换了狡黠的眼神和微笑。我天真地向他问好。他试图用狡黠的问题审问我：你在哪里？做什么？学什么？等等，仿佛我在面对某个情报人员。我的这位名字源自"精选"一词的叔叔，名叫穆斯塔法。他确实是一个奇怪的组合，集两种不相容的特质于一身：无知与狡黠。因此，我总觉得他扮演着老狐狸的角色。

那天我非常高兴，因为返程有车坐，不用步行。辛苦半天后，能坐车而不是步行回家，我会非常开心。我的"老狐狸"叔叔明白了这一点，在他要去旁边田地时悄悄对我说，他待不了多久，很快就会回家。这让我和父亲沟通，以便我能和叔叔快点走。父亲也明白了，于是帮我做完我正在做的事。

确实，老狐狸很快从他的田里回来了，拿着一些无花果和一些干草，他时不时带一些回城里的家，因为他在那里养了一些羊。游牧民永远是游牧民，即使他住在纽约的摩天大楼里。一看到他，我赶紧去帮他。而他则加倍表现出疲惫，抱怨岁月的残酷，利用我想坐他车回家的愿望。确实，我帮了他，然后去向父亲告别，坐上了那辆法国制造的504标致车。他在一连串总是让他成为英雄的故事中发动了引擎。既然父亲有一些他称之为“档案”的旧事，我在整个路上都警惕着老狐狸，尽量避免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尽可能不给他信息。因为他的狡黠可能会让你为你的天真付出代价，编造一个问题然后归咎于你的言论。但别无他法，我很累，必须回家。因为步行回去，走完超过2公里的路程，对我来说代价太高。所以我必须小心，只忍受那十五分钟，而我确实做到了。

这件事发生在我因某些人玩弄法律而被大学“驱逐”、艰难寻找工作的混乱时期。因此，老狐狸叔叔问我关于大学期间的研究项目，我快速解释了一下。然后他问我打算攻读的博士项目，我也解释了。但他用一句至今仍铭刻在我脑海中、似乎永远不会忘记的智慧之言让我惊讶。他对我说：“孩子，你很幸运。”

“幸运”这个词是对自认为受到不公对待的人说的！奇怪！

它对我的冲击很大，因此我毫不犹豫地问他：“幸运，怎么说？”

他说：“你很幸运，因为你被大学开除了，你通往博士的道路被切断了，因为你的‘杀手’正在芝加哥接受训练。”

我一路上沉默不语。老狐狸叔叔转而谈论了很多话题，试图减轻我受到的打击，但他没有成功。多年以后，我理解了他那句“你的杀手正在芝加哥接受训练”的含义。

我不相信阴谋论，但我知道，大帝国的强大只有通过占领其他国家、掠夺其人力物力资源、干预那些弱国人民的政治、文化和生活才能实现。鉴于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弱国，它注定要屈服于罪恶的法国，这使得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位置上安置了罪犯统治者，他们是阿尔及利亚人中最无能的人：杀人犯、道德和生理上的腐败者。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摧毁阿尔及利亚，鄙视它的人民。

当然，我不具备这些特质。我不是一个狡黠的伪君子，我不能接受为了谄媚（"谢伊塔"）而屈辱和卑贱。最重要的是，我努力在科学和思想上很好地塑造自己，以便名副其实地配得上"博士"这个头衔。因此，根据他们的评估：我是一个反叛他们及其标准的人，一个捍卫自己国家利益（他们实际上已将其卖给法国殖民者）的自由项目。换句话说，我是一个聪明的敌人项目，对抗他们的中心和图谋。

因此，老狐狸叔叔那句话的狡猾暗示如下：

你是法国殖民者手下那些大学教练的敌人。这些自称大学教授、却靠研究预算营生的无知者，他们真正的任务是边缘化每一个有能力进行真正研究、并真诚致力于阿尔及利亚民族复兴的人。简而言之：好在他们把你开除了，免得你成长起来，成为对他们存在的真正威胁，那时他们就会为你编织一个以杀害你为结局的阴谋。

我接受了任命，成为了一所小学的教师。我是那里唯一的男教师，其他全是女教师。当然，保安也是男性。甚至连校长职位也由一位女性担任。她皮肤白皙，是个高级别的骗子，顶尖的伪君子，集浮夸言辞和思想欺诈于一身。她不精通任何语言：既不是阿拉伯语，也不是法语，甚至不是方言。所以她求助于混合使用，下意识地运用罗马人的方法"分而治之"，在她所谓的教育团队成员之间编织阴谋、散布谣言，试图让所有人互相敌对，以便她能像管理自己家的官邸厕所一样管理这所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学校。

当然，我精通多种语言使我成为了这位卑鄙校长的目标。她很快就把我视为目标，给我起了个绰号"教阿拉伯语的亲法派"。为了实现她败坏我名声的目的，她与一些年长无知的女教师结盟。这里我必须指出，阿尔及利亚教育系统根据服务年限划分教师。你可能是一个差劲的教师（小学教师），但你在该领域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么你在公众和管理层眼中会比那个能力高但教育领域的新手教师处境更好。以至于在阿尔及利亚，"新教师"这个词成了文盲的同义词。这是一种绝大多数公众都共有的现象，他们以复合无知为特征，而管理部门则致力于加剧教师之间的分裂。

阿尔及利亚的教师（小学教师）面临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公众和国家官员（尽管他们声称相反）对他们的蔑视。简而言之：阿尔及利亚教师在各方面都受到鄙视，此外还有其可怕的工作条件。

阿尔及利亚教师的苦难始于教室的严重拥挤。一个班的学生人数常常超过三十人，有时甚至超过四十人。此外，他还必须在紧张的时间表内教授所有科学和文学科目，每节课只有

45分钟完成教学。他还负责通过持续、即时和定期检查来监督每个学生。此外，他还需负责查阅法令和行政文件并时常填写一些。他还负责在校园里看护学生，并被要求提供艺术教育课，从而成为音乐家或画家；体育课，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世界冠军；他还必须是伊玛目、演说家和声音洪亮的《古兰经》诵读家，以便教授学生伊斯兰教育。更不用说语法、词法、修辞、句法、口头和书面表达课，以及数学、实验科学和技术课。他还被要求每周授课超过三十小时，而且学校通常远离他的住所，因此他必须与阿尔及利亚的交通危机作斗争。除了所有这些职责，他还必须准备和参加督学在场的研讨会，提供辅导课，处理落后的学生，组织课外活动，如教育旅行，访问卫生部门以便让学生接受定期检查，此外还要准备测试和考试，监考和批改，向管理部门提交成绩并进行分析。他还必须接待憎恨他的学生家长，向他们解释他们孩子（学生）的情况，忍受一些家长的辱骂和攻击，以及阿尔及利亚媒体的攻击，它们抓住一些教师由于工作压力、国家、社会和家庭危机而诉诸可怕惩罚手段的事件大做文章。而所有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为了每天约五欧元的工资，甚至不足以维护他和他家人及亲人的尊严.....然后有人问：为什么阿尔及利亚没有发达的教育体系？！

以免我忘记，阿尔及利亚教师还必须（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须）装饰他工作的教室，整理柜子，每月更换一些装饰，有些是季节性的。他还必须每天上课前准备课程，每天填写工作日志。这使他更像奴隶，而不是先知。

我艰难地结束了在阿尔及利亚教育部门的第一年。这份职业的美妙之处——他们对我们撒谎称之为“使命”，提醒教师艾哈迈德·邵基著名诗句——在于与纯真一起工作。教师塑造一代人。少数真正在阿尔及利亚社会保持尊严的教师，使他们成为思想前线的敢死队员，他们无偿地与无知作战，并以极其简陋的手段与社会积弊抗争。这些每天备课、带着公文包去学校履行职责的贵族，尽管他们为此付出了一切，但他们值得尊重。顺便说一句：这些人极其稀少，他们是阿尔及利亚的“贵族”阶层。

在“布卡达·穆罕默德”学校工作两年后，我得到了换学校的机会。起初我并不在意，因为所有的阿尔及利亚学校在我看来都一样。无论我在哪所学校工作，我都会遇到使工作变得极其困难的问题。毕竟，我们试图教育所有阿尔及利亚人，无论大小。事实上，我的邻居自然科学老师给学生家长起了个绰号叫“大小孩”，因为很大一部分家长尽管持有大学文凭，担任高级职位，却没有文化素养。在他们眼中，好老师是那个“可爱”的（cute）老师，他过度温柔、甚至多余地对待学生，整个学年都和学生玩耍而不是教学，然后举行形式化的考试，给他们分配不反映真实水平的分数。这些分数已经变成了仅仅用于在邻居和大家

庭面前炫耀的社会表象。因此，哪个学生留级，他的家长就会视老师为敌人，必须通过各种手段，甚至诉诸暴力和侮辱来与之斗争。

阿尔及利亚的教育腐败至极，除了真主怜悯的部分。甚至教师——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该部门问题的原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下的社会地位压垮，于是随波逐流，就像任何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员工一样。

我发现在教育领域的第二年，我属于“本·古迪赫·古维德尔”学校教育团队。我仍然记得那天我去找它的位置，当我发现它位于特莱姆森市一个混乱街区的中心时，我放心了很多，因为我意识到那是一所为穷人开设的学校。我非常热爱穷人，同时憎恨他们的贫困。朴素的穷人与我的心最亲近，因为他们让我想起了我的人性：人道有其礼拜，其善功远胜于一些伪君子的鞠躬叩头，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所说。

校长带着狡黠的微笑接待了我。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个狡黠的人。他原本只是个机械工兼农民，在经历多年教育领域的磨难后，发现自己成了教师，然后跳到了校长职位。当然，这是为了追求行政特权，并逃避附着在阿尔及利亚教师身上的蔑视目光。阿尔及利亚在埃及之后，是非洲国家中校长最不关心学生、教师和学校本身的国家之一。但尽管如此，这位校长心肠很好，尽管狡黠。实际上，那种狡黠是他在—群卑鄙之人中自卫的武器。

我认识了新的教育团队，开始和他们一起工作。有伊斯梅尔，一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仍然充满活力，渴望生活，心地善良，笑容灿烂。他善于生活但不善于教学，没有文化，不懂得处理信息或如何向学生呈现信息。他用良好的态度来弥补这一不足，时而严厉，时而温柔。

和我一起在那所学校工作的还有“大师”阿卜杜勒·卡迪尔。一个靠机会主义为生的文盲，就像我靠面包为生一样。他和教育毫无关系，甚至后悔进入这个领域，因为他在整个工作期间——估计和我一生一样长——遭受了太多苦难。他比我的出生整整早一年开始工作。他非常谨慎，天真得近乎孩子气。尽管如此，他很有天赋，并带有常常让他陷入无尽困境的伎俩。

还有学校的保安，一个贫穷但自认为聪明的人。他就像校长手中的别针，像战士手中的剑，执行校长的指令仿佛它们来自神灵。生活已经足够亏待他，尽管如此，**"他自认为聪明"是他得以继续生活、哪怕是在时代边缘的原因。**

"本·古迪赫·古维德尔"学校的教育团队还包括一位穿长袍的女教师。也许她更接近"教育者"的称号，而不是教师。我用母亲的视角看她：她关心学生，尤其关心自己班上的学生，在教其他知识之前先灌输他们良好的伊斯兰行为。在那所学校我还认识了一些道德高尚、非常善良的女教师，她们中的一些在布特弗利卡及其走狗时代的阿尔及利亚实属罕见，感谢真主。

我绝不能忘记"本·古迪赫·古维德尔"学校的明珠——法语女教师。她是地道的阿尔及利亚人，宗教、习性、血统和空气都是。一个朴素的人，用姐妹般的眼光看我，是建议者和引导者。我把她视为我的第二位母亲（Yemma）。而她的丈夫，一位法语督学，是我一生中遇到过最高尚的男性之一。因此，我只能向**"本·古迪赫·古维德尔"学校教育团队的所有成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尽管我在许多观点上与他们不同，但我为与他们相伴感到非常自豪.....谢谢你们。

那所学校唯一的缺点是两个寄生的腐败行政人员之一。他占据着学校分配的职务住房，表现得像是它的独家所有者。尽管他假装友善和相互尊重，但我敏锐的鼻子不会错过背叛的气味。因此，我总是试图通过迅速向他提供一切好处来避开他的恶意。

自土地独立至今，阿尔及利亚学校最大的失败是未能培养出学生和教师。其内部发生的一切都是学生和知识持有者的扭曲复制品。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是掌控国家的思想屈从于**"法国妈妈"**的结果。而这些思想中的一部分试图通过建立另一个更落后、依附于开罗-埃及的项目来对抗殖民项目，打着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归属的幌子。在这两种思想之间，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学校迷失了方向。因为在阿尔及利亚教育体系的围墙内，没有人表达真正的阿尔及利亚文化。这种迷失反映在了整个阿尔及利亚公众身上。

我所在其"监护"下的督学属于那种试图对抗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项目的思想，但他内心却有一个独裁者的头脑。这是效忠开罗-埃及的东方思想的结果。这些人不理解民主的含义，除非它符合并服务于他们的利益。这使得教师在他的管理下遭受行政专横之苦，这反映在许多使他的行为更像军士长而非督学的做法上。这个人受大众议题驱动，受他无法控制的情绪支配。一旦同胞与他意见相左，他就与之斗争，并利用官僚权力以**"来自最高当局的决定"**为借口强加自己的观点。他用与阿尔及利亚公众其他阶层无异的蔑视眼光看待教师

，并与在他监督下工作的年轻一代敌对，认为年轻教师是无知、懒惰和漠不关心的人，仅仅因为他不喜欢年轻教师的发型、说话方式或其他属于教师个人的问题。于是他试图以“注重仪表”为借口破坏教师的形象。这给阿尔及利亚教育部门增添了来自“友军”的痛苦。

在阿尔及利亚教育道路上出现的少数成功模式是“自学成才”的模式。你会发现那个成功的人要么在外国大学完成了学业，要么在远离阿尔及利亚教育机构的情况下彻夜不眠地自我教育，迷失和徘徊在书籍和杂志之间。或者你会发现他为远离任何认可机构组织的科学研究投入了大量资金。遗憾的是，我们确实没有能够体面履行职能的教育机构。因此，很自然地，我们最终无法培养出成功者。我们的大学文凭甚至不被授予它们的大学所承认。如果阿尔及利亚人想在国外工作或学习，通常需要接受暴露其真实水平的录取考试。世界非常清楚阿尔及利亚教育机构所遭受的可怕失败。因此，阿尔及利亚机构培养出一位完全由阿尔及利亚制造的学者或哲学家，在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仍然是一个近乎幻想的梦想。为此，我们的大学没有被列入上海大学发布的世界排名：阿尔及利亚人拥有机构的外壳，却没有其灵魂。

只有其教育体系得到改善，阿尔及利亚民族的状况才能得到改善。这就是马利克·本·纳比在其著作中所表达的“塑造人”，也是我们在许多阿尔及利亚文献中在“人才危机”理念下所发现的，也是穆罕默德·阿尔孔所警告的，他称之为“制度化的无知”……等等。

向那些无条件热爱阿尔及利亚的贵族阶层致以所有敬意。这些教师、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他们致力于解决阿尔及利亚教育和教学体系所面临的问题。他们深刻理解导致阿尔及利亚一代代人困境、进而影响阿尔及利亚公众的根源。遗憾的是，法国之手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阿尔及利亚教育命脉的这种衰弱，因为官方法国完全明白，它留在阿尔及利亚土地上的关键在于其文化的留存。而这种“原住民”文化的留存只能通过歪曲替代方案来实现。因此，对抗法国存在的人不是依靠源自阿尔及利亚深度的本地经验，而是拥抱同样扭曲的东方项目，从而浪费了许多渴望舒适未来的阿尔及利亚世代的生命，导致了阿尔及利亚高贵子孙无休止的移民潮。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合法途径移民，另一些人则宁愿乘坐地中海的风浪，深信伊本·鲁世德的话：“知识在异乡是祖国，无知在祖国是流放。”

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的，永远不会是法国的，即使它想成为。阿尔及利亚也不是阿拉伯的，永远不会是阿拉伯的，即使有人希望如此。这使得阿尔及利亚就是阿尔及利亚，无论其舌头说其他什么语言，它都是柏柏尔人起源；无论它多么向往欧洲，它都是非洲深度的；无论它包容其他宗教并与它们和平共处，它都是伊斯兰教信仰的。

阿尔及利亚属于所有人，属于每一个持有阿尔及利亚国籍并为阿尔及利亚国家和人民利益工作的人。阿尔及利亚是多元的，但它的价值在于其阿尔及利亚特性。这正是教师必须让学生信服的。阿尔及利亚人和其他人一样，并不像东方阿拉伯的走狗所描绘的那样伟大，也不像法国殖民者的追随者所描绘的那样卑劣。他是一个有其优点和缺点的人。我们对就对，错就错。他服从法律权威，坚持公民精神。因此，我相信阿尔及利亚正在经历的是一场黑暗的文明阴云，只有通过建立坚实的机构才能消散。这些机构由包裹着民族意识的法律守护，所有阿尔及利亚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由工作价值和阿尔及利亚劳动者尊严驱动。让我们开始建立一个源于阿尔及利亚本身的阿尔及利亚国家，因为我们尚未建立它。

今天从阿尔及利亚人那里被盗走的最重要的文明建设因素是时间因素（le temps）。阿尔及利亚人意识不到时间的极端重要性。由此产生了个人的轻率和漠不关心。因此，阿尔及利亚人穿上了虚伪-谎言-谄媚的外衣，为浪费宝贵的时间辩护，这些时间浪费在为了在脆弱的软性体制前塑造个人形象而进行的尖锐的次要冲突中。

阿尔及利亚啊.....起来吧！

我从我的日子中学到了很多。我学会了如何不受打扰地生活：不打扰任何人，也不欢迎任何人的打扰。因此，我可以将我学到的东西总结如下：

1. 我们的名字比我们的实质更重要。总有一个谜语带着名字，但区别在于流通：名字是公开的，而谜语则极其隐秘。
2. 当你要求我尊重你时，你必须首先尊重我们之间的协议。请注意，协议是两个平等方之间的合同。
3. 在许多情况下，诚信问题会出现，信任存在的可信度成为疑问。你会注意到，最亲近的人不过是演员，在某些时期演技很差。
4. 既然宽容已成为弱点，那么我将像你对待我一样对待你。也许这样能让你感受到当你虐待我时我所感到的痛苦。我也是人。
5. 我想离开，但不知去向何方。我的目的地很多，而我的耐心很少。
6. 当你失去与周围世界的精神联系时，你将离去而不复返。
7. 我将离去，所以别太依恋我，以免告别变得艰难。

8. **我坚信**，言语是人在此生中的武器，是保证他继续活下去的唯一保障。那些发自内心、毫无障碍、毫无标题、毫无目的的言语，就像洋葱田里散发出的强烈气味。你可能因为它的刺鼻而不喜欢，但它在某个深处触动了某种感觉。

我坚信家庭（la famille）是我生命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境。这是一个我可以安全呼吸的空间。尽管我们姑且称之为“**核心家庭**”的小家庭缺乏**真正家庭精神**的许多方面，但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狂暴的阿尔及利亚群体浪潮中唯一的支柱。

当你在阿尔及利亚丛林中出生和成长时，你确实需要家庭、家族和部落才能找到照顾和保护。当然，不是为了侵犯他人权利，而是为了保护你自己的权利。这是缺乏建立公民身份的社会契约的结果。阿尔及利亚只在宪法文本中承认公民，而在我看来，这些文本类似于我的学生每周完成的书面表达作业。

我的家庭在经济上属于中等水平。它拥有的东西足以让你填饱肚子，并为你提供一个远离外部阿尔及利亚公众混乱的睡觉地方。有时他们同情你，因为你是其中一员；有时当你缺席或改变那些原本是为了迎合他们的习惯性动作时，他们会询问你。之后，如果他们察觉到你对所处境况的不满，就会用痛苦的鞭子抽打你的内心。因为阿尔及利亚家庭无论多么不同，都共有那种对丑闻的不合理恐惧。

对于我的家庭来说，丑闻源于腐朽的阿尔及利亚习俗，是一个根据无知者（他们主导阿尔及利亚的普遍心态）的幻想而变化的术语。其中，对宗教的陈旧解释起着根本作用，危险和伤害并存于此。

简而言之：没有犯错的余地。

原因是，在我的家庭作为阿尔及利亚家庭的一个样本看来，错误在大多数情况下，若公开发生，就带有丑闻的性质；若私下发生，则成为应受谴责的错误，在童年时期，谴责往往是体罚。而丑闻的惩罚可能达到排斥和抵制的程度，如果它是那种能激起阿尔及利亚人饶舌和幸灾乐祸欲望的类型。

这意味着，作为一个生活在阿尔及利亚家庭怀抱中的阿尔及利亚人，就是要成为天主教意义上的圣人，远离丑闻和错误，公开远离罪恶和流言蜚语。同时，你可以很容易地成为对自己、家庭和周围人最邪恶的罪犯，而且是秘密地，并且被允许这样做。

这种意义上的错误（已转变为具有极大危险性的秘密）制造了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伪君子 and 大多数阿尔及利亚妓女。这是“群氓”逻辑强加的行为结果，它将错误视为丑闻，同时取消了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解决方案：承认、悔改和获得宽恕的可能性。

我每天都在阿尔及利亚丛林中体验着这种地狱，每时每刻都警惕着这些腐朽信念的守卫者的建议和评论，并忍受着这种软性状态强加给我家庭的生活每一刻的束缚。

综上所述，我可以说，在阿尔及利亚丛林范围内、按照这些标准和在这些条件下，我不倾向于建立自己的家庭。原因很简单：我不希望在我年老体衰、处于无力和衰老的困境中时，监视我的孩子们经历我从小经历的一切。

按照阿尔及利亚标准建立家庭，从社会学概念上讲，只有社会失调者才会从事这种生命自杀行为。因为家庭的核心是支持和包容，在家庭良知（本质上是生活所有细节的合作原则）的监督下。而这个核心恰恰是当代阿尔及利亚家庭中最主要的缺席者。

直到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阿尔及利亚家庭仍然屈从于傲慢的单一专制权力。这是一种巨大的不公。这里让我承认，那种单一权力已经改头换面，变得更加柔软，但仍然存在并具有影响力，甚至在涉及最细微的日常细节时拥有最终决定权.....遗憾的是。

阿尔及利亚丛林中的攻击性行为就是我们所说的暴力（la violence）。当阿尔及利亚人在表达（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方面束手无策时，它是一种本能的动物性表达。既然阿尔及利亚人是那个在情感和艺术上受压制、在实践和行动上迷失的人，那么他诉诸暴力表达就成了必然，而非其他选项。因此，暴力在这个概念下成为必须面对的基本组成部分。

由于从出生到坟墓一直伴随着阿尔及利亚人的系统性压迫，他的行为偏离了正常轨道。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的压力，阿尔及利亚土地上的个体变成了一颗随时可能快速爆炸的定时炸弹。这使得无论时间多长，事情都注定会发生。

从我小学学习直到大学毕业后，在我与同龄人甚至与其他个体的接触中，我常常发现阿尔及利亚人在日常交往中诉诸语言或身体暴力。确实，我也基于“自卫”原则参与其中，这是阿尔及利亚丛林所包含的动物群体中唯一能找到的生存法则。

根据我的信念，暴力是艺术（l'art）的强制性替代品。在阿尔及利亚的情况下，艺术要么被放荡所取代，要么被僵化的教权主义狂热所取代。

我记得很清楚，我参加了我唯一在世的小姨的一个无知儿子的婚礼。由于这个阿尔及利亚人想娶他德国舅舅的一个女儿（“青春期迷恋”）的愿望失败了，他被迫娶了一个邻居的女儿作为替代，这使他倾向于举办一场“伊斯兰式”婚礼。

根据这些人的说法，伊斯兰式婚礼是禁止男女混合的，强迫女孩戴头巾，用巴勒斯坦战斗赞歌取代歌唱和舞蹈，并在新郎入洞房之夜，跟在新郎身后高呼“月亮为我们升起”的赞歌。

我记得当时我和邦邦坐在新郎家的一个房间里。邦邦突然有了个主意：为叔叔的婚礼献舞。

当我小姑姑的儿子提出这个主意时，我觉得这很自然。我同意了那个简单的想法。邦邦走向录音机，播放了一首赞歌，我们开始欢快地跳舞。由于赞歌声音很大，外面听到了。之后，他的一个叔叔冲了进来，关掉录音机，向我们投来仿佛我们犯了罪似的目光。

在这些阿尔及利亚人看来，跳舞有损男子气概的荣誉。在他们的词典里，男人不跳舞、不哭泣、不崩溃。他们把男性塑造成只存在于他们病态想象中的神话生物。

那时我正处于探索年龄。这样的行为使我厌恶一切与宗教相关的东西，因为这些无知者的宗教剥夺了我跳舞的权利。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话：“我不信任不跳舞的神。”

我们大家庭并不都是我那个无知表兄弟的类型。我们曾被邀请参加我侯赛因叔叔（愿主怜悯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的婚礼。那是一场各方面都很美好的婚礼。他们在他宽敞的地窖房子的每个角落都安装了扩音器。整个周四晚上，那些机器都响彻着莱伊音乐：谢卜·哈利德、谢卜·马米、谢卜·印迪等等。尽管当时政治气氛紧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但每个人都跳舞了，包括我的大姐，那天她和我"小姑姑"的女儿一起跳着奇怪的动作。如果我们不用艺术来点缀我们快乐的时刻，那么鲜血就会来完成这项任务，因为毁灭性的暴力语言。

在阿尔及利亚人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概念之一是先入之见（les *prejudgements*），它是形成印象的基本组成部分。这种特性导致许多个体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陷入冲突。仅仅根据一个人居住的地方就对他形成全面的印象，这是违背理性和逻辑的。

我总是面对这个问题："你住在哪里？"这不是出于无辜的动机，而是提问者为了对我做出先入为主的判断。我常常想到这个回答："我住在地球上。"但我犹豫是否让那个爱管闲事的人听到。

我正在分析的这个问题，其基本结果之一是令人憎恶的种族主义。如果你承担起仅仅根据肤色、说话方式或居住区域来确定一个你不了解的人的品质，那么你基于沉淀在你内心（不是你形成的，而是历史形成的）的预设数据自动地不公正对待他，你的灵魂会轻易接受这些数据，无论是通过教育（灌输）还是天真。

这些先入之见会产生很多问题，尤其是当我们知道它们是**基于**评估性预设的确定性判断，而后者会剧烈动摇，使得整个事情从幻想出发，形成更危险、远非逻辑序列的幻想。

在阿尔及利亚公众中，人的外表在形成对他的先入之见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恰恰促使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关注这个可憎的外表，超越价值观的面纱，并以各种琐事为指导。例如，职业也扮演这个角色。一个在行政部门工作、领导部门或机构、穿着考究西装、打领带、驾驶一辆过得去的汽车、试图用许多颠倒的法语词汇来点缀其阿拉伯-柏柏尔语舌头、并住在被归类为高档社区公寓里的人，所有这些特征使这个人成为阿尔及利亚公众各阶层中的重要人物，即使他是文盲，继承了他所拥有的大部分东西，并且他的大部分谈话都是关于谎言和捏造的自夸和吹嘘。

所有工业产品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了引导评价和判断阿尔及利亚个体的指标。他的手机、衣着类型，甚至他其他用品的类型（特别是汽车类型）决定了人们对待他的方式。

部落和家庭归属也有作用。由于某种原因，某些部落在阿尔及利亚公众中受到排斥，这使得子孙后代仅因血缘关系而付出文化和社会代价的账单。这是种族歧视最明显的表现，它使白皮肤的人仅仅因为从父母那里继承的肤色就比他的黑皮肤兄弟更高级。在独立的阿尔及利亚，贫穷已变成一种罪行，人们常常因此受到暗含的侮辱。金钱变成了被崇拜的偶像，甚至那些自称虔诚和禁欲的人也是如此。人的价值与他穿什么、住在哪里联系在一起。那么：你是什么肤色？你在哪里工作？

这些分类从根本上源于无知。它们也是阿尔及利亚公众内心深处那种弱点的表达模式，这种弱点由于几个世纪以来将阿尔及利亚人变成“原住民”、然后又变成“加什”的宣传而渗透到灵魂中。所有这些都旨在分裂使阿尔及利亚人意识到提升其思想家子孙地位的重要性（行动上而非仅仅口头上）的平衡人格。

主导阿尔及利亚交往的先入之见将个体引向两个方向之一：要么是鄙视者，要么是被鄙视者。正是这个具体原因使得阿尔及利亚这个善良国家的忠诚天才要么从公共生活中退出，要么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离开不公的土地。

父亲坐在院子里等待日落礼拜的宣礼。弟弟躺在客厅的床上玩手机。我和小妹妹在准备早餐桌。母亲在厨房完成剩余的各种食物安排。这是斋月（le mois du Ramadan）中普通的一天，是我们这个保守的阿尔及利亚式小家庭最喜欢的月份。

宣礼员开始宣礼。我和兄弟姐妹们都围坐在桌旁，而父母在做完礼拜后加入我们。因为在我父亲那正统方式信奉宗教的观念中，功修不容拖延。

斋月的这些日子有一种独特的氛围。我们从黎明到日落戒绝饮食和性行为。我们剥夺自己这些没有它们生活就无法继续的必要品，作为对至高无上真主的牺牲。这类似于原罪的痛苦，是必须经历的苦涩之事，以净化被罪恶玷污的灵魂。

日落宣礼后，我们释放自己的灵魂，做白天禁止的一切，仿佛我们变成了蝙蝠，持续整整一个月。我们中没有一个人理解这些行为的深意，尽管我们都认同它们确凿存在于所有古代经典，特别是《古兰经》中。

我相信这样一个月份的奥秘在于忍耐（La patience）：忍耐饥饿、干渴和性欲，忍耐最贴近人心和内在冲动的事物。仿佛我们被命令抵抗生活，对抗生物规律和时间轨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人的重组，通过剥夺（对食物、饮水和性的剥夺）来熔炼他。

在这个神圣的月份，出现了一些帮助不幸者的倡议，许多伪君子也浮出水面，乘着席卷许多阿尔及利亚人的宗教情感浪潮。而朴素的阿尔及利亚人则站在镜子前审视自己、回顾，很多时候严厉对待自己疲惫的灵魂。这就是尊贵的斋月。

我不理解的记忆之一是那些由父亲陪同去清真寺履行“间歇拜”的日子，几乎在斋月的每个夜晚。父亲自我出生以来（“在我看来至少”）就坚持履行这项礼拜。穆斯林一致认为这不是主命，然而它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利用了控制阿尔及利亚公众的破旧传统的权威。在阿尔及利亚观念中，几乎不履行间歇拜的人就成了不信道者。即使没有阿尔及利亚人说出这个判断，我确信他把它隐藏在他狭隘的心里。

阿尔及利亚浪荡子在斋月开始前四十天不喝酒、不吸毒、不吸烟。这个传统我也不理解，因为伊斯兰教历十月二日晚上是这类阿尔及利亚人著名的狂欢之夜。每个浪荡子喝的酒量足够他在平时喝一个多月：这是在喂养压抑的本能。

斋月过后，是阿尔及利亚观念中的“小开斋节”，或阿拉伯语词典中的“开斋节”。我们用不同的传统甜点、新衣服和“宽恕巡访”来迎接它，这原本是拜访亲戚、熟人和邻居以表达情谊和显示友善的活动。这是赤裸裸的虚伪场景。

在阿尔及利亚丛林中斋戒很容易。阿尔及利亚人从出生起就戒绝性行为，也许有一天会屈服于虚伪道德的权威而“开戒”。而戒绝饮食则是兽性的行为，与宗教和世俗都无关，尽管许多学者和宗教人士在我们耳边重复说，这是为了让斋戒者感受到穷人所遭受的。在我看来，这一切有所不同，因为没有个体能感受到其他个体，每个个体都只关注自己。

阿尔及利亚人之间关系中最突出的缺失是人际关系中的基本要素，即尊重（Le respect）。阿尔及利亚人不尊重任何人，甚至不尊重自己。这是所有个体在不经意间陷入的问题的核心。

我在上午十点半从不安的睡眠中醒来。这是斋月的一天，对我来说也是被迫休息的一天。叫醒我的是父亲（愿主佑助他）在家中升高的声音，他既痛苦又愤怒，因为他在他兄弟的一个浅薄儿子养在他农场旁边的蜜蜂那里遭到猛烈攻击。当然，父亲和其他此类袭击和蜇伤的受害者一样，除了威胁和恐吓外，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自很久以来，这“在祖父农场养蜂的问题”就一直如此。

在一个春假的日子，父亲要求“我和弟弟”去农场照看祖父（愿主怜悯他）种植的李子树。当然，我们勉强答应了，因为农场像大多数农场一样位于区域之外，确切地说，它位于07号国道旁边，一个叫“瓦萨尔”的村庄里。这使得我们去程和返程都遭受交通不便之苦。第二个原因是来自大家庭成员的问题，我们经常在那里遇到他们，代价是我们的神经和情感。

那天，我们没有早起，这让我们拖到下午才去农场。我们开始干活，在灌木丛间翻土移动。由于付出的努力和暴露在烈日下，我感到疲惫，于是走近一瓶水解渴。

突然！

弟弟朝我跑来，重复着：“蜜蜂……给我水。”

仅仅几秒钟，我们和蜜蜂的战斗就开始了。它们凶猛地攻击我们，让我们像疯子一样朝各个方向奔跑。当情况稍缓，我们打电话给父亲，他反过来要求我们回家。当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在我和弟弟遭受蜜蜂袭击多年之后，现在轮到父亲自己也从蜜蜂那里得到报应了，而且方式可能更痛苦。实际上，整个家庭无一例外，都遭受了攻击和蜇伤的份额，但都徒劳无功。养蜂人继续在农田和居民区附近活动，他们收获金钱和蜂蜜，而我们收获奔跑和蜇伤。

如果我们阿尔及利亚人之间、作为家庭、甚至作为人类，存在哪怕一丝尊重，这些人本可以找到解决这种琐碎但伤害他人的问题的办法。这证实了古训所言：“你若不知羞耻，就为所欲为吧。”

这些事件只是阿尔及利亚丛林中关系处理方式的简单样本。这里没有所谓的尊重原则，而是有另一个原则占据了这一崇高价值的位置：恐惧原则。阿尔及利亚人遵守界限不是因为他尊重你，而是因为他知道越界的后果，也就是说，他害怕你。要不是那种恐惧，他会乐于践踏你。

因此，商店、公交车、公共场所和私人场所、行政部门和机构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争吵不断。尊重的缺失仅仅是阿尔及利亚人之间缺乏沟通文化的结果。这种文化我们在家里学习，然后在我们街道的角落和田野里寻找却不见踪迹。因此，一个其个体互不尊重的群体，是一个内在冲突、无组织、携带更多引爆自身而非持续发展因素的群体。

看着小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巴基——那个亲近我心的小家伙——迈出他的第一步，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的弱点及其对知识和探索宇宙的贪婪。因为尽管弱小，但仍试图聚集所有能量去行走、触摸事物、拿起或翻转东西的孩子，是被造就成热爱挑战的生物，即使在他最黑暗的时刻。正是这一点使人类朝着其人性实现了巨大的精神飞跃。

儿童是一种新形式的生命存在（l'existence）。他是父母的延续，是不同形式的生活，是用新时代工具的第二次生命。这使他能够承载自己，远行于连最亲近的人都无法理解甚至接收的世界，因为它们简单来说：不属于他们的时代，也不说他们的语言。

"孝顺的子孙为他祈祷"——这出现在伊斯兰/人类遗产中，其地位等同于益人的知识和持续的施舍。仿佛永恒只局限于这三件事。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进行持续的施舍，也不是所有人都是思想的富人，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撰写书籍和文献，因为他们大多数被无知淹没，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生育子女。这是来自上天的智慧之一。

它在人类中平均分配，仿佛永恒分散在同代人的阶层中，构成了世代严格保存却不知情的遗产（L'héritage）。为了持续施舍的价值，其所有者关注它，并在离世时嘱咐善待它。为了言辞的重要性，书籍和手稿作为人类历史中无价的部分被保存在图书馆和豪华的大厅里。为了对儿女深切的关爱，父母日夜操劳，照顾和服务他们直到生命的最后机会。这里

，我想起祖母（父亲的母亲，愿主怜悯她）临终前几天躺在病床上的情景。那时，在虚弱无力的时刻，她递给我一瓶香水。她没有忘记她的小儿子、她抚养了生命中很长一段时间的孙子。这就是永恒的计划，活着的人感受不到。

因此，当一个人用心照料真主赐予他的一切恩典时，他就是不朽的。在我看来，这就是存在的奥秘，我们姑且称之为：关爱（faites attention）。

在我看来，关爱是那些发自人类内心的行为，试图通过他所拥有的东西在他离世后延续生命。在这个位置上，它被认为是个人（无论其文化、语言和归属如何）在我们的日子（它们不断更替而非增殖）中留下痕迹（la trace）的唯一昂贵方式。

仅仅关爱是不够的，个体还必须坚持意志、关注和真诚。这三者是支撑施舍/知识/子孙这个三角的基石。这里是关键所在。

当你想要关爱某物/思想/个体时，你不会在指南手册（le catalogue）中寻找合适的方法，而是会追随你小小的内心。这种价值被认为是人类跨时代歌颂的最高人文价值之一，是卓越的东方（orientale）特质。

小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巴基试图在父亲房子二楼行走，想走到阳台上捕捉从门口照进来的光线，这是多么美好。更美妙的是，他一到达光线处，就转向我，对我微笑，表示感谢和对我帮助他爬楼梯所付出努力的认可。这是天性，而我们中的一些人被跛足的西方文明所迷惑而扼杀了它。关爱只有在与人类个体和谐的环境中才能成长。它没有独立的琴弦，可以在远离他人的情况下独自演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类似于瓦格纳的音乐，不是用单一乐器传入耳朵。

"男人用眼睛爱，而女人用耳朵爱。"这句话从各个层面概括了恋爱关系的一切。而我的一位舅舅将这句话字面意义上地付诸实践，成为了无可争议的花花公子。尽管她们各不相同，但多年来女人们仍然对他趋之若鹜。秘诀在于：他甜蜜的舌头、温柔的谎言和浸透着致命情欲的调情。

我的舅舅（母亲的兄弟）是个花花公子。他结婚次数不计其数，他的一些妻子去世了，一些离开了他，另一些他离开了她们。剩下的都是短暂性关系，不乏类似英国特工007式的冒险。实际上，他的私生活与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的生活非常相似，不过是穷人版。

这位舅舅（花花公子）生了很多孩子，男孩女孩都有，来自不同的女人。甚至我怀疑他是否认识他们所有人，因为太多了。他的人生目标是尽可能多地与女性发生关系，尽可能长时间地相处。在他看来，生活就是持续的性（sexe），除了亲密关系，别无其他。

"阿尔及利亚女人（les algériennes）生来双腿之间就有一道小缝，地球上的每个雄性都想在里面放点东西。她们比雄性弱，因此学习不同的策略，利用她们的头脑和性本能来本能地进行侮辱（l'insulte）。"

我从小就认识这位舅舅的一个儿子。他名字源于"征服"。他是一个安静的人，在一个偏远的村庄度过了艰难的童年。他勉强完成了小学、初中和高中学业，通过了高中毕业会考，然后进入阿尔及利亚大学深造，离开了那个小村庄，来到了城市。在这里，他陷入了青春期危机，迷失在城市文化的浪潮中，被安逸的生活所迷惑。于是他发现，在他出生和成长的洞穴之外，有一个广阔的世界。

我舅舅的儿子遭受了很多痛苦，尤其是来自家庭忽视。他的母亲是一个愚昧无知的女人，父亲是个花花公子，没有时间浪费在抚养子女上（他因为孩子太多、母亲不同而把他们的名字和母亲的名字搞混）。因此，我舅舅的儿子性格形成于压抑的框架内，获得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温柔而安静的软弱（la gentillesse de faiblesse）。只要他意识到你比他强，他就很安静；一旦他意识到自己更强，他会毫不留情地吞噬你。

在使他失去学业成功希望的青春期之后，我舅舅的儿子发现自己完全游离于社会框架之外，将报复那个将他远远抛弃的社会作为目标，无论通过何种手段。但他必须先为自己正名，按照独裁者布特弗利卡的方式，安静地报复。这正是他小心翼翼着手做的事情。

首先，在他生命中唯一的支持——我的外祖父艾哈迈德（愿主慈悯他）——去世后，他开始找工作。他经历了失业、营养不良和被鄙视的重压，直到通过与一个富人合伙获得了一份工作，在这次合伙中，他以可怕的方式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尽管如此，为了社会压力，

他接受了，以确保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然后进入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为他打开了多扇大门。

其次，他以谄媚者（"谢亚特"）的身份加入了改革与指导协会。这使他在那里赢得了"兄弟们"的心。在虚伪虔诚的掩护下（因为这个协会隶属于阿尔及利亚"哈马斯党"），这使他得以在慈善人士和施主们的帮助下，与一位女孩结婚；重返大学完成法学院学业；并利用"哈马斯党"（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分支）的影响力，不留级地逐步晋升，直到提交硕士论文，并在毕业同年获得了大学教练的职位。这就是阿尔及利亚丛林：只要你得到当权派某方的认可，你就能突然变成重要人物。

当等式逆转，我舅舅的儿子获得了可接受的、甚至相当重要的社会地位时，他背弃了许多在他童年帮助过他的人，甚至那些在他被边缘化、软弱和贫穷时给他送食物篮的人。他将他们从熟人名单中删除，证实了阿尔及利亚民间谚语："别怕吃饱的人挨饿，要怕挨饿的人吃饱。"

通过耐心和良好的支持，你可以实现任何事情。

姆祖瓦尔·穆罕默德·萨伊德

所有家庭成员都因新冠病毒（covid-19）而遵守居家隔离。唯一不遵守的是父亲。他是唯一挑战隔离的人，依靠他个人对信仰的解释。他认为寿限是前定和命运，却忘记了伊斯兰教明确的命令："你们不要自投于灭亡。"正如古兰经经文的意义所示。但当涉及与一个拥有胡阿里·布迈丁式思维的阿尔及利亚人对话时，固执的滋味混合着夹竹桃的味道。

当我躺在卧室时，有人敲我的门。是我的小妹妹叫我，告诉我晚餐（"喝茶时间"）准备好了。我振作精神，稍微整理了一下本来就乱糟糟的衣服，然后走下楼梯去厨房与家人会合。我坐在父亲对面的桌子旁，开始了一场类似于古代拜占庭式讨论的谈话。但是！拜占庭人的讨论比我和父亲的讨论要深刻得多。

父亲仍然视我们为未成年人，无法形成自己的观点。同时，他试图为我们打开对话空间，以显得像一个“酷”爸爸，试图包容我们。这是家里每个人都熟知的伎俩，当然，除了我母亲。

在谈话中，父亲说出了他性格中的一个关键词：社会（la société）。这时我站出来反驳他，指出阿尔及利亚还没有社会，因为社会服从于某种独特的动态，使其内部与各种社会现象协调一致，即使这种机制看起来是随机的、不存在的。因此，将“社会”属性赋予阿尔及利亚公众是可怕的。由此，我认为阿尔及利亚人是一个聚合体（rassemblement），这个术语才能将他们集合起来。

像往常一样，父亲坚持使用“社会”这个词，尽管他清楚地知道他在自相矛盾。但“山羊即使会飞也是山羊”的逻辑驱使他走向观点极端，并以完全激进的方式发表奇怪而暴力的判断。于是我们陷入了代际冲突的陷阱。而我根本不认为这是阿尔及利亚代际之间的冲突，原因很简单：阿尔及利亚没有社会，一块没有社会的土地怎么能产生代际呢！

在阿尔及利亚民间概念中，“代”（la génération）是指那些随着时间推移进入或接近老年的人群。简而言之：他们是一群在阿尔及利亚土地上出生和长大的个体，除了名字之外，与“群体”一词无关。而他们之间的基本共同点是年龄相近。这就是问题所在。

阿尔及利亚概念中的“代”（如果这个表达正确的话）问题在于，它免费向阿尔及利亚人贩卖幻想。它赋予一部分阿尔及利亚人生物学上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使阿尔及利亚民族疲惫不堪。因为这种合法性使阿尔及利亚的这一代或那一代将并非由他们创造的荣耀归于自己，仅仅因为他们见证了这些事件。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且像八月某天正午太阳一样清晰的例子。

生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阿尔及利亚一代，总是试图夸耀一个边缘的（即使对他们来说似乎重要）成就：阿尔及利亚足球队战胜西德足球队。这一代的所有人（除了真主怜悯的人）都试图表现得好像他们生活在黄金时代，并且由于他们经历了一场足球比赛的氛围（这场90分钟的比赛远离逻辑和算计，也许他根本没看过），他们就比其他代人领先了光年。于是我们发现，生物学合法性是制造阿尔及利亚人之间冲突和滋生他们之间普遍怨恨的丰富材料。它负责用幻想来装饰荣耀，其益处为零，而社会危害则不计其数。顺便说一句：父亲当时也观看了那场比赛并经历了其氛围，遗憾。

我常常听到一些阿尔及利亚作家自称知识分子。例如，我经常看到作家阿明·扎维在不同卫星频道的采访，尽管我与他观点分歧很大，但我尊重他的观点。我常常听到他对采访者说：“我不是唯一呼吁某某的人，还有很多知识分子……”等等。我直接推断他将自己归类为知识分子。我也清楚地记得黎巴嫩作家阿里·哈尔卜在与一位阿拉伯半岛记者对话时的话，他说：“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和出租车司机之间的区别在于写作。”还有，几个月前，在一次与一位同事的对话中，他对我说：“某某没文化也没教养，他甚至没通过小学，尽管他声称相反。”

因此，我有必要提出以下问题：

什么是文化（la culture）？谁是知识分子？称作家为知识分子合适吗？我能称持有大学文凭的人为知识分子吗？是否有特定的机构制造知识分子？

抛开穆罕默德·舒基·津在其著名著作《匮乏时代的文化》中所写的内容，也抛开阿尔及利亚哲学家马利克·本·纳比（被驱逐的阿尔及利亚哲学家）的《文化问题》，我不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我是一名作家、哲学家，在我生命中的一段时间里，我还是程序员；而在另一段时间里，我是阿尔及利亚学校的阿拉伯语教师。尽管如此，文化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我，因为在阿尔及利亚，这个术语总是与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即使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联系是虚假和错误的。

我相信文化是人性兽性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分界线。知识分子（intellectuel）是人，是那些努力在日常生活中尽可能恰当地评估形势，并据此行事的人。中国兄弟们在恰当评估事物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不能称作家为知识分子，即使他写了成千上万本书。但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确实是知识分子。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作者可能是潜在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领域是显而易见的。

阿尔及利亚大学文凭持有者根本不是知识分子，我也包括在内。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述，教育机构缺乏科学/思想精神。知识分子不会诞生于幽灵出没的巢穴，也不会像苍蝇如腐肉般滋生的环境中成长。因此，在独裁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大学培养出知识分子是极不可能的，除非如我所见，未来在遥远的将来事情发生变化。

我的同事和朋友"拉菲克"持有大学文凭，但他像远离"医生"这个词一样远离"知识分子"这个词。他通过作弊通过了高中毕业会考，将一些纸条藏在衬衫褶皱里带进考场。之后他进入大学，时而与大学教练玩利益共享的游戏，时而为了取得学业分数而作弊。毕业时，他的论文只是对另一篇论文的复制/粘贴/打印，加上少量简单修改。然后他成了大学文凭持有者：请问文化在哪里？！要知道有很多"拉菲克"，甚至还有比他更懒惰、更卑鄙的人，他们强行占据和占领阿尔及利亚大学。可以称他们为知识分子吗？当然不。

如果在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有知识分子，那肯定是那些坚守人性、通过自学发展心智、并为保持心灵纯洁纯净而奋斗的人。这是一个非常稀有的类别，即使存在，他们也隐藏不露，不向人们展示自己，以保护自己的存在免受阿尔及利亚人中思想和文化蝙蝠的侵害。

如果你问我关于教育（l'éducation），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母亲。是的，教育是母亲。母亲是孩子教育的首要参照，是这个新生命思想储备的第一和最后来源。实际上，根据我作为小学教师的工作，我能够观察到孩子之间的差异源于母亲教育水平的差异。我在这里仔细斟酌了我的话。我说的是教育水平，而不是教育程度。母亲是个体的第一个工厂，在决定其未来性格方面起着根本作用。

母亲是家庭规则的第一制定者，作为其家庭首要和最重要的监护人。如果母亲理智，家庭总体上就会趋向理智方向；如果母亲更情感化，家庭就会变得富有诗意；如果母亲是动物性的、无意义的，家庭就会支离破碎，倾向于分裂并乐于各种冲突。

谁想建立一个稳定的家庭，就必须仔细选择母亲。她将以她认为合适的方式保护他的家庭。母亲就是家庭，如果我们想概括的话。这并不否定父亲在这一领域的有效作用，但母亲由于与孩子的紧密联系，是帐篷的支柱，是家庭的实际管理者和直接负责人，在所有社会和所有文化中都是如此。

我认为女性的基本任务在于履行其家庭职责。她生育，这个角色是男人无法完成的，尽管他拥有其唯一的钥匙。她拥有足够的女性心智方面的成长，使她能够充分接纳她的孩子，这也不是男人所具备的。她能够一步一步陪伴子女，这需要持续的耐心，父亲无论多么沉稳也不具备。那个将女性形象置于法国格言中的奠基人有多么聪明，因为女性确实是社会中的决定性因素。今天没有时间列举的例子向我们阐明了女性在各个时代伴随的成功。

如果你想打击任何社会的核心，你只需要打击它的女性。如果你在打击女性的精神（先于任何其他方面），你就会可怕地撕裂世代。这就是基督教王国在与穆斯林的安达卢斯土地斗争中所做的，这也是布特弗利卡独裁政权在阿尔及利亚土地上所做的（或者它想这样做，以执行隐藏的议程），一方面通过家庭法，另一方面（隐含地和实质上）将阿尔及利亚母亲引入空洞的固执冲突中。

固执是女性的杀手。它是嫉妒的基本生成者，嫉妒发展为羡慕，然后转变为怨恨，成为对社会和个人一切犯罪行为的可怕驱动力。一个怨恨其环境的母亲将为周围的公众生下具有破坏性细胞级别的子女，摧毁一切。这种行为导致民族自我爆炸。而被固执蒙蔽双眼的母亲，会发现她总是将家庭推向深渊，即使父亲理智而明智的声音也无法使她回心转意。于是父亲宁愿退出家庭管理，旁观他的家庭被自动碾碎；或者与母亲冲突，导致家庭破裂。面对母亲的固执，父亲无论多么明智，都会发现自己面临两个苦涩的选择。同样，一个在子女中播下不和的母亲，通过描绘他们比别人更优越——比如眼睛颜色或肤色——她就像蛀虫，通过传播不会随着她本人消失而消失的种族主义，侵蚀人性本身。

无论母亲们做了什么，这些行为的主要责任在于父亲们。要不是他们、他们的同意和陪伴，就不会有家庭，也不会有母亲。

我热爱阿拉伯语（la langue Arabe）到了极致。当我听到有人流利地讲阿拉伯语，或有人用阿拉伯语演唱歌曲片段，甚至有人以优美的方式朗诵阿拉伯诗歌时，我内心深处仍然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吸引力。阿拉伯语对我这样的人就像酒对酒鬼。我用一口标准阿拉伯语的美酒沉醉于诗歌和散文。

我在阿卜杜勒·卡迪尔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了阿拉伯语字母表，那对我来说非常困难。学习阿拉伯书法对小孩子来说很难，因为它有必须遵守的严格规则。我从电视上通过以动画形式讲述世界名著如《悲惨世界》等的卡通片，以及母亲观看的配音成标准阿拉伯语的电视剧中汲取了语言素养。我也会和她一起看那些剧集。

在阿卜杜勒·卡迪尔老师指导下学习字母表三年后，我转到了萨利哈老师的班上。她确实是最和蔼的老师之一，以极大的温柔和优雅培养了我们的书写技能。之后我转学到了“侯赛因·宰托尼”学校，在那里，我的丰富知识在纳斯拉老师（愿主慈悯她）的指导下得到了磨练。小学阶段结束时，我在布哈里德·穆罕默德老师的指导下学会了书写清晰的字体。这位老师专注于让我们写清楚，他当时的座右铭是：如果写不出漂亮的字，至少写清楚。

小学毕业后，我在侯赛因老师、格里什老师、苏菲老师和法拉杰老师等人的指导下学习了阿拉伯语。他们每个人都激励我们用阿拉伯语阅读、写作，并品味《古兰经》经文和纯正的阿拉伯诗歌。

阿拉伯语像德语一样，含义有力，结构坚固，是愿望的忠实守护者。它引导其主人将理性与情感融合，因为它有一种奇特的能力，使你能将人内心所蕴含的一切翻译成永恒保存在记忆封套内的字母。这使它成为真正区分海浪与泡沫的过滤器。

在诗人中，我认为穆太奈比是世界级的巨匠，他的诗歌确实奇迹般；尼扎尔·格巴尼（愿主慈悯他）是当之无愧的语言天才；泰米姆·巴尔古提是语言犀利的诗人；哲利尔是杰出的阿拉伯语面包师.....等等，还有很多。

在散文中，我发现纳吉布·马哈福兹、乌萨马·法齐和阿斯玛·森贾斯尼等人的著作具有无限的才华.....等等，也有很多。

阿拉伯语电影表达了阿拉伯-穆斯林在许多情况下的内心。甚至那些词汇一半以上是阿拉伯语的方言，在装饰意义上是高雅的。因此，我只能成为阿拉伯语舌头和情感、阿拉伯忧患和抱负、阿拉伯写作和阅读、阿拉伯表现和虔诚、阿拉伯人性和深度的人。

我的阿拉伯特性并不妨碍我为我的柏柏尔血统感到自豪，也不妨碍我为这种使我昂首挺胸的阿拉伯特性捍卫真理和美德。这是接纳达德语（阿拉伯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远非种族主义和狂热，最接近男子气概、雄风和尊严。

精确是阿拉伯的，随意是游牧的；深度是阿拉伯的，精髓更是游牧的。沙漠是阿拉伯的，荒野比它更阿拉伯。你可能会发现一个在沙漠中心放牧羊群和骆驼的游牧民，比宫廷诗人更雄辩、更标准，因为这种阿拉伯语的语言禀赋远非那些虚假和错误地归属于阿拉伯语的独裁者的舌头可比。穷人先于富人、朴素的人先于暴君学习的语言，是充满他称之为"协商"的民主的语言。傲慢、暴力、排挤和边缘化只是那些自称拥有豪侠和荣誉的流氓的特性。

阿拉伯语不会成为另一种拉丁语。阿拉伯语只会保护使用者的尊严。尽管黑暗笼罩，但黎明将至，阿拉伯人啊。

在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成为一名作家（l'écrivain），你是在玩火。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憎恨作家，原因有很多。我非常幸运地选择了三个选项，每一个都使我成为阿尔及利亚人憎恨的目标。这正是我所得到的，一种超乎想象的憎恨。

阿尔及利亚人将哲学与疯狂、不信道甚至无益的饶舌联系在一起。因此，选择哲学并努力成为一名哲学家，你就选择了一个阿尔及利亚人内心和外表都憎恶的专业。这是阿尔及利亚人恨我的第一个原因。

至于第二个原因，阿尔及利亚人憎恨教师。而我是一名教师（小学教师），这增加了对我的憎恨，这使我的社会处境（如果这个表达正确的话）恶化，而不是改善。

而作为一个哲学家、教师，再加上“作家”这个词，并用三种语言（法语、阿拉伯语和英语）写作，你就将自己置于任何阿尔及利亚人都不會羡慕（即使事实上，这是一个使你成为最病态的嫉妒者目标的原因）的境地和位置。在社会层面，你将进入必须报复的敌人行列。

当你写作时，阿尔及利亚世界会从陛下（拥有话语权者）的角度看你。这将你周围的阿尔及利亚个体分为两类：

1. 阿尔及利亚人害怕你的话语，嫉妒你的成功。于是他们试图将你所做的一切描绘成徒劳的胡闹。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追踪你的过失，也许会发现一个错误并传播它，而不是传播你获得的成功。剩下的人则试图在你的作品上贴一个谎言，希望能让人们忽略你所写的东西。阿尔及利亚人当然天生倾向于相信虚假和捏造的谣言，甚至不加核实，因为他们满足于解渴仇恨文化（这是他们在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土地上巨大冲突的乳房中获得的）的谎言。
2. 阿尔及利亚人（通常是你亲近的人）害怕你的话语会将他们带入阿尔及利亚独裁统治的地窖监狱。因为极有可能，阿尔及利亚落后团伙中的某人会告发你，于是你编织的话语会成为现成的指控，使你毫无理由地尝受折磨。因为阿尔及利亚的独裁者像恐惧图片一样恐惧自由作家的话语，这些图片在无知的阿尔及利亚人心中种植对他们所处境况的意识。

因此，有人怕你，有人为你担心，有人嫉妒你，他们都试图永远让你沉默、扼杀你的声音。

我置身于这三种人之中。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这种无与伦比的愚蠢使我写得更多，学习新语言以用它们写出更多文本、更多作品和大量书籍。你们在我身上浪费时间，而我决心写作。与其说是固执，不如说是决心按照我想要的方式描绘我的生活。因为在我看来，写作（l'écriture）是一种自由，是许多人不理解的崇高途径。

阿尔及利亚群体的奇怪之处在于，它假装尊重作家，同时内心憎恨他，日夜为他编织阴谋和诡计，嘲笑他和他的作品及写作，用莫须有的罪名诋毁他。而所有这一切甚至没有读过这位作家写的哪怕一个字。真奇怪！

一位用法语写作的阿尔及利亚作家，被一个自称捍卫伊斯兰教的人判为不信道，仅仅因为他写了一部小说，甚至这位“谢赫”没有读过这位作家的一个字：想象一下，我亲爱的读者，他发出了对一位作家的追杀令，而他甚至没有读过这位作家写的一行字，而追杀令的依据正是他没有读过的那部小说……我与你们无干，我敬畏真主——众世界的主。

尽管如此……我仍将写作。

我作为一名小学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阿拉伯语教师的工作，正如我之前所述，使我对阿拉伯语规则有些敏感。在不经意间，我发现自己会纠正那些用这种语言和我说话的人的一些用词，尤其是如果是拼写、语法甚至一些严重错误的修辞错误。我会纠正它们，作为一种条件反射，自然而然地。

这件事曾多次促使我在餐桌（午餐、咖啡或晚餐）上纠正我小妹妹的一些话语，这引得父亲多次嘲笑我的这种行为，给我起了个绰号“阿布·路易哈”。当然，这件事没有太困扰我，因为父亲由于殖民时期及其对独立阿尔及利亚的影响，对阿拉伯语无知，尽管他出于无知也狂热信奉伊斯兰教。但他的这种行为让我脑海中浮现一个问题：为什么父亲那一代人嘲笑“阿布·路易哈”？

在我看来，这位阿布·路易哈是阿尔及利亚的贵族之一。他年事已高，从事教育工作，很久以前就开始教授阿拉伯语。即使退休后，他仍然忠于那份职业，这体现在他的言谈中。他极其注意在说话时使用阿拉伯语，在日常履行职责时对一些句子进行语法分析。也许他会在街上遇到某个路人，你会发现阿布·路易哈叔叔向他询问一个语言谜语或一条阿拉伯语规则，仿佛他在免费给任何人上阿拉伯语课。

阿布·路易哈一生都生活在萨布拉（Turenne）地区，并教导了那里的许多子孙。尽管如此，这个人仍然遭受该地区所有居民（除了真主怜悯的人）的蔑视目光。他们嘲笑他标准的舌头，仿佛标准是犯罪，应受惩罚。他们为自己使用的混合方言感到自豪：既不是阿拉伯语，也不是法语，也不是希伯来语，也不是波斯语，也不是柏柏尔语，而是所有这些语言和其他语言的混合体，是一种非书面的口头方言，使他们的小而浅薄的头脑仍然生活在文字发明之前的时代。我亲爱的读者可以问问历史学家或谷歌搜索引擎，让他们告诉他文字是哪一年发明的，以便他理解所有嘲笑高贵的阿布·路易哈叔叔及其标准舌头的人有多么落后。

如果我追随高贵的阿布·路易哈叔叔的道路，那对我来说是无比的荣幸。如果我能高举你们声称的《古兰经》语言、伊斯兰教之前的艾布·哈卡姆的语言、穆太奈比、卡尔布·本·祖海尔的语言（名单很长）的旗帜，那对我来说是所有的荣幸。但令人困惑的是：一个信仰《古兰经》的人，怎么会嘲笑一个热切关注这部《古兰经》语言规则的高贵之人呢？

这是阿尔及利亚人所经历的迷失的又一个证据，是语言和情感上的迷失。罪恶的法国殖民通过其罪恶政策奠定了基础，在阿尔及利亚土地独立后，阿尔及利亚独裁政权完成了这一计划，产生了缺乏明确参照的个体：他们既不是法国人，也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自由的柏柏尔人。他们是不知道、也意识不到自己无知于知识的人，嘲笑每一个有知识的人，公开承认知识的价值，但内心憎恨认知和定义的行为。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留在无知中，正如古训所言，享受他们的无知，并嘲笑那些试图教育他们子女（先于教育他们自己）的人。

即使这些人贬低高贵的阿布·路易哈叔叔（我父亲也是其中之一），我也只能脱帽向这位热爱阿拉伯语的男士致以敬意和尊重，尽管这些阿拉伯人憎恨他、嘲笑他。原谅他们吧，阿布·路易哈叔叔，因为他们不知道。

就像托马斯·谢尔比先生尽管深爱女服务员却与她断绝关系一样，我也与我所爱的黑皮肤姑娘解除了婚约。我和托马斯先生分享着同样的感受：因失去信任和离别孤独而产生的痛

苦。这对我来说一点也不容易，尽管我是在巨大的社会压力和我们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与她断绝关系的。在这段持续仅几年的关系中，我学到了一个阿尔及利亚人需要二十多年才能学到的东西，这是在阿尔及利亚深处与一位阿尔及利亚姑娘结婚经历的精髓。

我的第一次阿尔及利亚境外旅行，我感到一种奇怪的感觉。与预期相反，那种感觉接近于回归祖国的感觉。仿佛我脑海中的过程是颠倒的，特别是当你通过警察检查站，然后通过海关时，我感受到的是回归感，而不是离别的孤独。仿佛我在阿尔及利亚旅行了多年，现在到了回到我未知祖国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否存在于许多阿尔及利亚旅行者身上。尽管如此，我仍然记得当我踏上那片异国土地（逻辑上）而我内心深处（心理上）却感到熟悉时，那种攫住我身体的颤抖。

许多阿尔及利亚人离开了被多种锁链束缚的阿尔及利亚土地。每个热爱自由和尊严生活的人都计划逃离伟大的阿尔及利亚丛林。许多移民乘船出海，另一些人则翱翔天空，而其余的人则因生活在海外天堂作为原住民的泥潭中而绝望死去。

移民和逃离阿尔及利亚丛林的计划一直萦绕着我。一去不复返（*aller sans retour*），一个自我高中（定向阶段）以来就占据我梦想内心的梦。那是一个与青春期幻想相关的梦，但随着我在理智和心理上的成长，我意识到逃离这片只将其果实给予民族败类的天堂，是一种义务，或者用古人的话说，是每个穆斯林男女的主命。

我放弃按照传统阿尔及利亚方式与一位深处阿尔及利亚丛林核心的阿尔及利亚黑皮肤姑娘结婚的计划，是受移民远离这片土地的动机驱使。因为，除非替代目标足以填补她离开的空虚，否则打破一个女人的心并不容易。

移民歌曲启发了我，特别是那些传达“哈拉夏”（偷渡客）悲剧的歌曲，其中包括摩洛哥歌手“塔勒比·万”演唱的名为“哈拉夏”的标志性歌曲。有很多歌曲记录了阿尔及利亚移民在欧洲土地上的遭遇，但前面提到的那首歌深深地渗透到我的内心深处，甚至在我内心深处激起了许多渴望，先是它的歌词，然后才是旋律。

仿佛像我这样的阿尔及利亚人生来就是为了移民、逃离和在他初次接触、最终将接纳他的土地之外书写他生命的词语。这取决于时间和事件。这正是我每当重新审视过去生活时所感受和感觉到的。因为促使我远离出生地的最重要刺激之一是不公和正义的缺失（l'injustice）。阿尔及利亚土地上的生活教会我，我们像活人一样生活，却怀着死人的心。

我并非孤身一人处于这种境况。观察阿尔及利亚男女在外国大使馆签证申请名单上的计数器，观察那些希望获得乘飞机（即使是飞往地狱的飞机）许可的长队。因为阿尔及利亚从林许诺给我们的生活，不值得几代人为成功付出的努力、疲惫和不眠之夜。阿尔及利亚的成功失去了它的滋味，因为它不遵循“有志者事竟成”的规则。你可能一生努力奋斗，但最终除了悲惨和困苦，一无所获。

我梦想的不是欧洲或美国女孩的蓝眼睛，而是远离阿尔及利亚丛林灌输给我们的那种文化所带来的宁静。那种文化使我们过着双重生活，注重外表而非情感和怜悯，使我们在固执的机制下举办婚礼盛宴，关注琐事。这种机制使我们与阿尔及利亚公众结婚，而不仅仅是年轻人娶一个姑娘。

当我还坐在阿尔及利亚大学椅子上时，父亲（愿主佑助他）要求我去拜访我们家族的一位成员，那位和我父亲同名的人，借口是这个人是一位大学教授，也许能给我一些建议。我确实这样做了。我找到了他，发现这个人在他的专业领域是思想巨人，一个亲法派（亲法国）到了骨髓的人，甚至无法用阿拉伯语组成一个正确的句子。实际上，他认为阿尔及利亚方言是他唯一能理解的阿拉伯语，而且还是个塑料无神论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按照阿尔及利亚人的习惯，我这位亲戚以为我拜访他是出于利益动机。但我没有通过任何人干预就取得的结果，使他相信我行为的单纯。我只有在决定选择一个专业的那天拜访过他，其余的相遇都是在学院门口或去大学大楼的路上偶然遇到的。

我对这位亲爱的亲戚的唯一一次拜访，是去他在伊斯兰法学院大楼里的办公室。这种矛盾对我来说是嘲讽和嘲笑来源：一个自称极端世俗主义的无神论者，怎么会接受在“反动分子”（按他的说法）大楼里的办公室？但利益的语言有不同于我们朴素者所理解的含义。

我敲了门。里面传来尖锐的声音回答，然后他平静地打开门，以传奇般的热情欢迎我，邀请我进去，在他为重要访客准备的办公室一角坐下（我从家具布置和周围的装饰可以理解）。

谈话从他询问父亲和家庭情况开始，然后转向大学学习和大学教练的话题。在他看来，其中一些人甚至不适合在我们田地和农场里放羊。然而，在那次会面中，他对我说了一句话，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他说："孩子！在我们的大学里，大学文凭人人可得，而学问属于想要的人。有两条路可以达到成功：第一条通过狡诈和欺骗，第二条通过勤奋和努力。既然你才刚刚开始，你必须选择哪一条更适合你。"

确实，这些话概括了许多阿尔及利亚大学场景，这些场景大多由对其学生犯罪的罪犯领导，他们披着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的外衣（虚假和错误地）。时间向我证明，我的亲戚是对的。我确实选择了努力和勤奋的道路，并将挑战坚持到底。如果不是腐败在这些机构走廊中蔓延，我的成功本会达到顶峰。但这是一场永恒的斗争，我选择了疲惫和荣誉的一方，因此我在无知的官僚面前输掉了战斗，在布特弗利卡独裁时代，该时代奉行抬高轻浮男女、排挤每一位忠于祖国的贵族的政策。

我的亲戚选择了与大学犯罪妥协。他与他们和睦相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也能与野兽搏斗的野兽。他在法国人的狡诈手下学习，在阿尔及利亚人的诡计手下磨练，为我们产生了这种混合物：对善者善，对恶者恶。这类阿尔及利亚人是任何情况下都受益的阶层，因为他们遵循"国王死了，国王万岁"的逻辑。

在我生命的各个阶段，我从未保持中立。我总是站在朴素、受压迫的阿尔及利亚人一边。我总是反对暴政和暴君，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因为政治舞台充满了斗士，但我采取了文化途径，因为文化领域仍然被吸血者和吸墨者垄断。他们向年轻的阿尔及利亚页面喷吐谎言，伪造历史和记忆。因此，我认为这类腐败者对朴素的阿尔及利亚人最危险，因为他们的影响像媒体一样，甚至更危险、更有影响力，因为他们针对的是思想而非身体。欧洲文艺复兴是我们的教训：哲学-文化革命（哲学、艺术和科学）发生在政治和经济革命加冕之前。对于所有沉思者来说，基本原理是：理论先于实践。

我的大姑姑的丈夫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人，尽管他有时假装无知。他是一个稀有的工人类型。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就城市和村庄之间奔波，作为一名建筑工人。大多数与他共事过的人都证明他工作认真，注重所承担的任务。我无疑从他身上学到了工作中的决心和严肃。

这个男人幼年丧父，据说遭受了继父的虐待。环境和继父的专横迫使他早早辍学，因为他的教育水平在当时法国/殖民计划下没有超过小学。在阿尔及利亚土地独立后，他发现自己成了一名朴素且流动的工人。

他年轻时曾前往马赛（法国南部）并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祖国，因为他无法忍受与法国人（天主教徒）一起生活，因为他那一直指导他生活的天生的伊斯兰宗教教育。

他建立了一个家庭，并尽其所能让家人幸福，尽管物质条件有限。但他稳健的头脑使他甚至超越了许多今天自称有文化和科学的人。这个人拥有的诚实使他能够组织好自己的生活，兼顾工作、家庭和清真寺。

我古西叔叔让我欣赏的是他总是微笑，尤其是在最艰难的时刻。甚至贫穷也没有影响他。他的许多熟人说，这个特质（真诚而透明的微笑）是他从他母亲阿迪亚（愿主慈悯她）那里继承的，她是一位真正的女性，尽管生活严酷，却总是微笑。

除了这个人的认真，还有他的微笑。这是面对生活的两个极其强大的因素。

我经常遇到古西叔叔早上陪我坐公交车去工作地点，或者晚上下班回来。我们之间的谈话通常围绕当前问题和时事新闻。尽管他的观点谦逊，但赋予其观点的宗教色彩使它们具有必要的深度。这是生活中勤劳的信徒的常态：你总是能在他们的话语中找到引导你走向真主的东西，而你自己却不知道。当涉及目标时，这就是意图的纯洁。在阿迪亚婶婶在世时，古西叔叔在所有方面都对她非常孝顺。他深刻地、准确地服从她的话语。在她去世后，他极度悲伤。由于她的福泽，他今天与他的家庭（在孙辈来到这个世界后已变成大家庭）一起度过着最美好的日子。

要不是我大姑姑的无知，古西叔叔本可以过着更朴素、更轻松的生活。但没有人有完美的人生。因此，我可以认为她给他造成的问题是他必须支付的税，是我们呼吸的日子的税。

古西叔叔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没有为他们分配足够的时间，他未能恰当地教育他的子女。这反映在他们悲惨的生活中，使他们生活在无与伦比的文盲状态中，尽管其中一些人持有大学文凭。他们被琐事所迷惑，由于阿尔及利亚公众沉浸其中的社会固执，他们也沉溺于这些无休止的漩涡，这些娱乐使人更加悲惨和不幸。

对子女的责任不仅仅在于提供食物/饮水/衣物/住所。孩子们也需要父亲和母亲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需要情感和温柔。这里的情感不仅仅是拥抱，而是延伸到一步步陪伴他们，贯穿他们生活的各个阶段。

一个平常的工作日。我站在公交车站，等待乘坐最早一班开往我住所方向的公交车。一辆车来了，我被迫挤进人群，发现自己坐在朋友易卜拉欣旁边。我们真诚地拥抱，开始谈论学习、研究，特别是心理学（这是易卜拉欣当之无愧的专业，需要磨练才能达到世界水平）。

易卜拉欣让我欣赏的是他与自己和睦相处，意识到他每天都要与之抗争的悲剧。像每个人一样，他有时会感到因前景闭塞而产生的疲惫。因为阿尔及利亚丛林不会给忠诚的子孙留下任何出路。

我们的谈话持续了三十多公里，在一辆拥挤不堪的公交车上。周围有许多"雷达"像耳朵一样，甚至捕捉我们的呼吸次数。尽管如此，与易卜拉欣交谈我感到安心。要不是时间紧迫，我可以和他聊上几个小时而不厌倦。

我们到达了具有传统西班牙风格的区域。我们在古清真寺大楼旁下车。奇怪的是，它的伊玛目一生从未进过学校，几十年来一直在那里带领礼拜者，每周五向他们布道。

我们去了附近的咖啡馆继续我们的谈话。我们点了一些饮料（咖啡和牛奶）和一些食物（通常是不同口味的甜点），然后开始边吃边嘲笑我们的状况、阿尔及利亚公众的状况，并表达我们内心的抱负和梦想。

在我们"德尔维什"咖啡馆的一次聚会中，一个疯子走近我们的桌子。他向我们打招呼，然后要一些钱。当然，我根本没有理他，只是对他重复了"愿主供给"这句话。而易卜拉欣对

他微笑。那个微笑鼓励了那个疯子要一块甜点。易卜拉欣心甘情愿地给了他一块，然后在他离开后，我介入又要了一些甜点。

我们结束了那无尽的谈话。我们走了一会儿，然后分开了。但我脑海中只剩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没有主动给那个疯子那块甜点？

确实！为什么？

在我生命中的许多时刻，当我站在十字路口，必须在我自己和他人之间做出选择时，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我自己。这就是那次聚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也许这是我众多孤独的原因之一。

是的！

当涉及选择时，我在行为上是自私的。我选择我的利益，优先于他人的利益。我常常拼命捍卫那些选择，无论条件和情况如何。

我们在家里、学校围墙内和大学里被教导，自私是破坏性的行为。但阿尔及利亚的现实反过来使每一个具有“利他”（优先他人于自己）品质的人成为应受嘲笑的天真者。

即使你找到一个像我一样不关心他人的人，因非自私者可能遭受的损失而产生的深度自责，会促使他在某个时刻抓住内心隐藏的自私。阿尔及利亚公众中有很多剥削者，他们伺机利用每个非自私者的善良，剥夺他的灵魂、物品甚至各种权利。

在这样的现实中，个体发现自己不得不在用自私（往往是过度的）保护的权利（这些权利常常是自私的）和天真之间做出选择。天真使他为了暂时的心理安慰（很快会转变为对失去权利的良心谴责）而放弃属于他、他有权利的东西。因此，在阿尔及利亚丛林中的这种自私概念使许多人心中消失了怜悯。

我对软件和信息学的极大痴迷使我经常光顾网吧，长时间坐在电脑、手机和平板电脑屏幕前。我遨游在这个广阔的空间里，阅读许多网站页面、报纸、杂志甚至科学和思想研究中心的网站。这也使我参与在这些页面上写作。我的世界变成了虚拟世界，我拒绝阿尔及利亚公众的世界及其所有标准，因为它是一个用十六世纪的心态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

在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我在哈吉·马克创建的社交媒体网站上创建了我的第一个账户。一年后，我在全球微博网站上创建了一个账户。我与这两个网站一起度过了最美好和最苦涩的时刻。因为我生活的虚拟世界从通过谷歌巨头搜索的静态网站，发展到了始于雅虎、并在脸书（le Facebook）达到繁荣顶峰的虚拟沙龙形式的动态网站。

社交媒体教会了我如何认识文化和种族，如何与不同的人交谈并接受他们，一个小屏幕如何照亮你的房间，揭露许多戴头巾的女性和虔诚男性的道德，一个人如何变成一个像其他机器和算法程序一样的数字项目，这些程序除了数学和物理标准外不服从任何标准。

社交媒体将我从疯狂和文化自杀中拯救出来。它将精确如伦敦大本钟的世界抛在我面前。通过它，我意识到西方不是法国，宗教不是沙特阿拉伯或开罗。它教会我，中国和亚洲是值得在所有时间和场合脱帽致敬的民族，非洲比它看起来的更有深度。

当你通过你的电子账户眺望世界时，你会意识到自己在这片广阔人海中的真实规模。你根据全球标准知道你的文化、艺术和语言价值。你用你自己的眼睛看生活，而且只有你能控制它。

通过电子网站，我也了解了性文化，以及性行为如何不过是一种更新人类能量的生物过程。我认识了世界音乐杰作，并进入主要博物馆，看到了不同文明最重要的作品。通过网络，我坐在我的小房间里远行。因此，我通过美国宇航局的网站了解了宇宙的无限性。

我通过网络实践了通过书籍认识的哲学，在阿尔及利亚大学讲台上缺乏可敬的大学教授的情况下。于是，我通过 Skype 应用程序的帮助，参与了从牛津大学到巴黎大学的大学研讨会。

我从电子屏幕汲取的这些哲学中，记得例如西方现代哲学，主要是现象学（la phénoménologie），这门课曾由一个类似于脱衣舞女（strip-teaseuse）的无知者教给我们。而那个无知者和那个舞女之间的区别是，她每脱掉一件衣服就变得更美，而他每露出他那恶臭的臀部就变得更丑。要不是我定期通过网络（l'internet）查阅的研究，以及我从电子页面下载的书籍，我永远不会知道哲学、西方现代哲学以及埃德蒙、弗雷德里克和马丁等人的作品是什么。网络和父亲（愿主佑助他）为我们购买的电脑，弥补了大学及其所包含的只有在阿尔及利亚空壳机构中才能找到的疯狂和胡闹。

不了解当代（21世纪）现实的人，就是那个不善于使用网络、满足于通过社交媒体（特别是脸书）了解阿尔及利亚琐事的人。阿尔及利亚人不是去认识新世界，并利用网络的恩惠发展自己，而是将他的琐事转移到这个广阔的虚拟空间，在所有文化和文明面前暴露他的卑劣。

我早上六点离开家，今天去坐火车。我穿过“风”区，走到每天八天前不开门的车站。我和许多其他旅行者一样站在铁路旁。这种交通工具是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的遗迹。天气极其寒冷，所以我左手拿着公文包，右手放在口袋里。突然，我的一个大伯父的儿子出现在我面前。他是那个老狐狸的长子。我向他打招呼，他问我，我问他我们的状况和大家庭的状况。我们彼此微笑很多，并沿着整条路开始交谈，因为这条火车沿着一条破旧的轨道行驶，两旁树木和岩石林立，穿过一些隧道，经过一些桥梁。简而言之：我们乘坐的是移动的危险。

老狐狸的儿子是大家庭中无可争议的天才（un génie），也很虔诚。他慷慨好客，和蔼可亲，言论和观点合乎逻辑，论证有力，生活朴素，在各个方面都很警觉。因此，与他交谈时我感到无与伦比的安心。我专注地听他说话，并自由地与他交谈。

要不是他父母的无知，这个天才本会在适合他的位置上创造奇迹。要不是阿尔及利亚丛林领导者的卑鄙，这个人本会在成就上达到星空。但正如古训所言：“召唤无回应者无生命。”尽管如此，他内心仍保持着研究精神的活力。他以严格系统的方式叙述事实，在你面前撒下许多珍贵的思想碎片，然后将它们收集起来，形成独特的结构，在撼动心灵之前先撼动思想。

在许多思考的时刻，我问自己：是什么驱使阿尔及利亚丛林的子孙在学校围墙内发疯，或在（姑且称为）惩罚机构的铁窗内胡闹？为什么这片土地憎恨每一个忠于它的人？

对于这个表达一种社会状况的疑问，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这种状况是子孙从祖先那里继承的，它使阿尔及利亚成为一个被各种锁链束缚的巨人，这些锁链越来越紧，给这个迷失的阿尔及利亚公众带来痛苦。

天才在阿尔及利亚丛林的土地上被边缘化、受压迫、内心动摇。要不是他们像瑞士钟表一样精确运转的头脑，他们本会在其土地和子孙中制造破坏和毁灭。但拥有这样头脑的人，内心却怀着纯净的心灵，无论不公在阿尔及利亚人中多么猖獗，都不会动摇。因此，他们每一位都值得致以最芬芳的问候，带着敬意和尊重。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火车到达倒数第二站。我和我的堂兄弟（Mon cousin）下车，去了一家咖啡馆。我们重新喝咖啡，吃了一些甜点。我们谈论政治、经济、工作中的问题以及一些研究和调查（那些由网站、书籍、杂志甚至报纸发表的）。然后我们分别，希望再次见面。每次我见到阿布·阿里，我就意识到生活是不公的，但其深处携带着拯救的种子。每次我与这位虔诚的苏菲交谈，我都能从他的话语中感受到对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和穆斯林宗教真诚的爱。这些事情在阿尔及利亚公众现实中变得罕见。因此，我总是乐于与这位美好的人交谈，并总是很高兴见到他。

我相信真主的公正，我极度渴望他的喜悦。因为我确信他没有创造我们是为了折磨我们，而是创造我们是为了崇拜他，并因崇拜他而幸福。这就是我一直坚信必须行走的道路，无论代价如何。

2020年5月18日 星期一

特莱姆森（阿尔及利亚西部）